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 广西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9.125 印张 插页 10 202 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1601-8/K·104 定价：4.50元

内部发行



图1 1966年原区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接受群众批斗时，在大会主席台上。

前排右至左：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霍泛。

图2 1969年乔晓光同志（右第一人）在朝阳广场被批斗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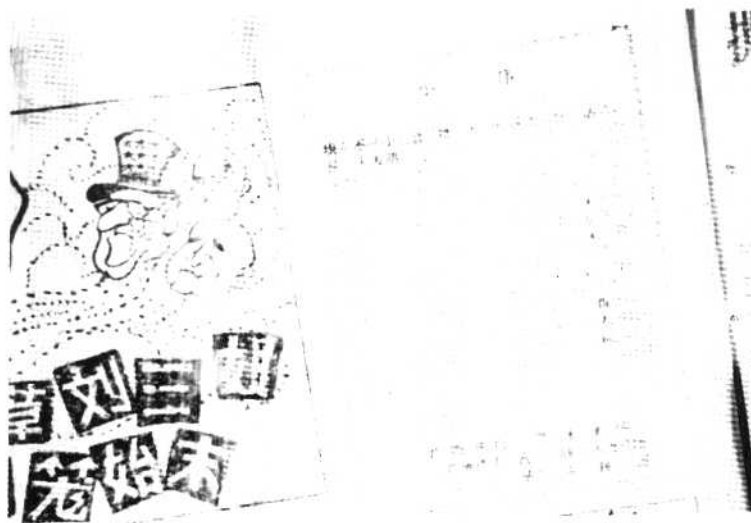


图 3—4 在“文革”中,广西优秀剧《刘三姐》被当作毒草批判,这是批评《刘三姐》的连环画。



图5.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广西日报社被二十多个造反组织的造反派冲击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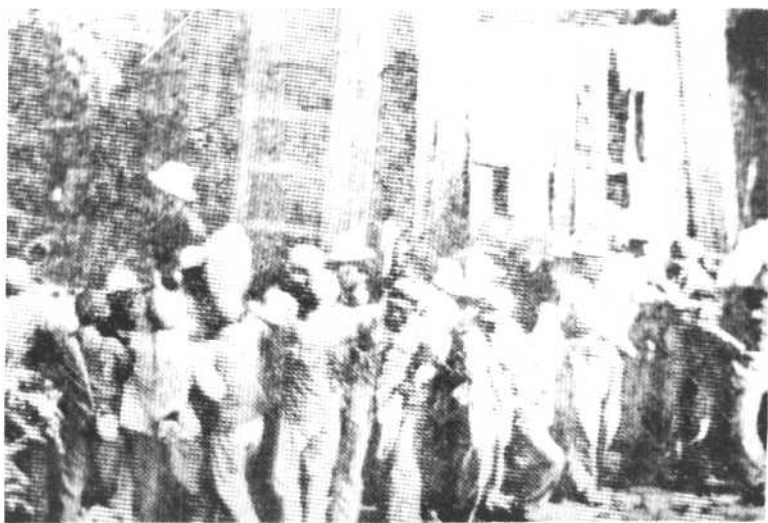


图6. 解放军手拉手筑成人墙，阻止两派冲击军管广西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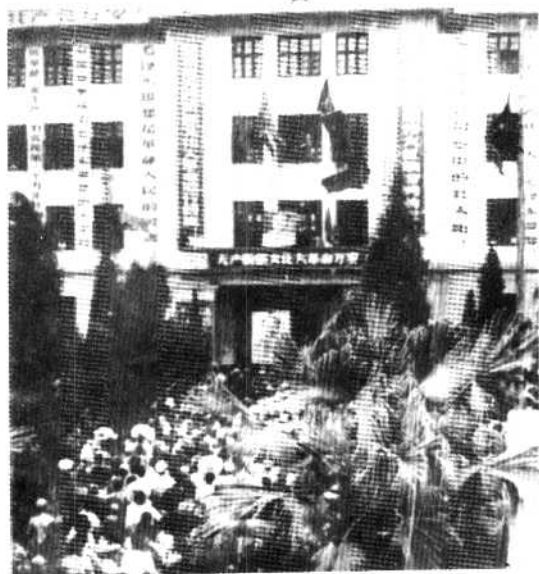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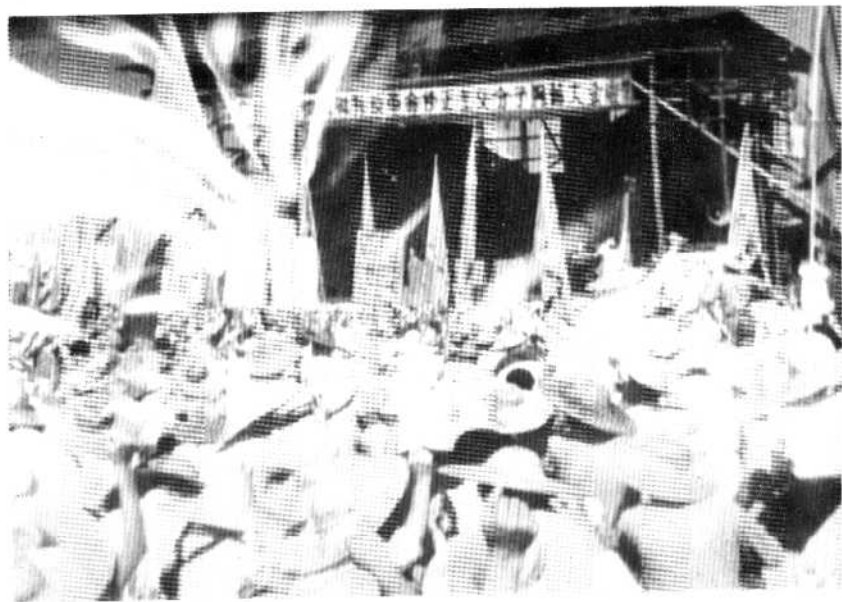


图7. 1967年5月25日二十多个造反组织的造反派再次冲击广西日报社。图为“5.25指挥部”（即联指）造反派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4.22”造反派进行辩论的情景。

图8. 1967年1月中旬，全国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这是当时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多个造反组织在南宁联合召开批斗陶铸大会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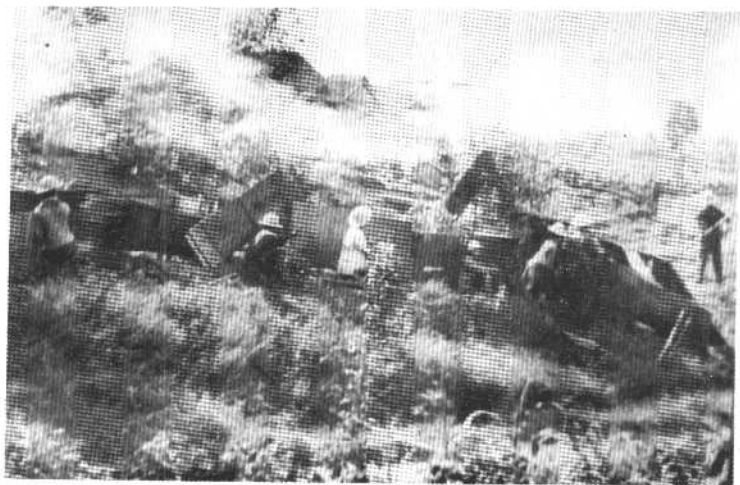


图 9—10 1967年 6月13日南宁市第一中学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持续至15日上午结束。从此揭开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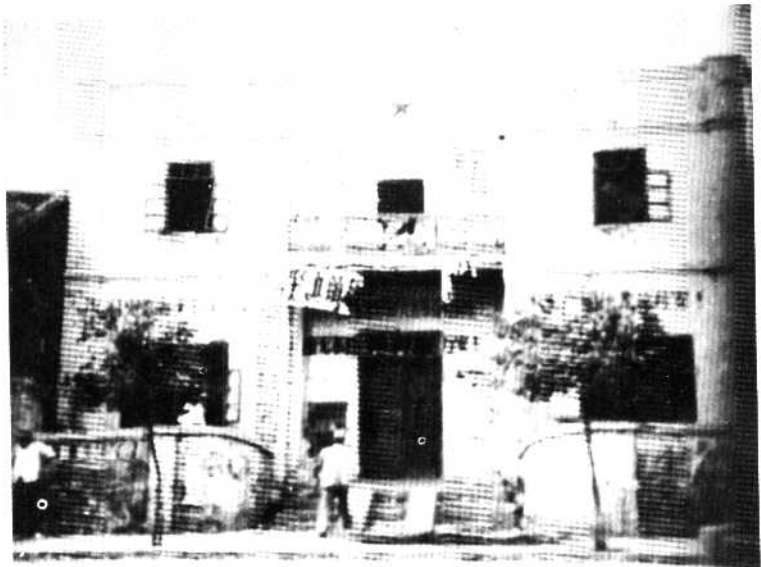


图11—12 1967年6月15日南宁市永宁公安分局和永宁公安派出所被“4.22”造反派攻击，将该分局副局长、派出所指导员二人打死，并将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材料烧毁。

图13. 1967年7月间南宁地区“联指”造反派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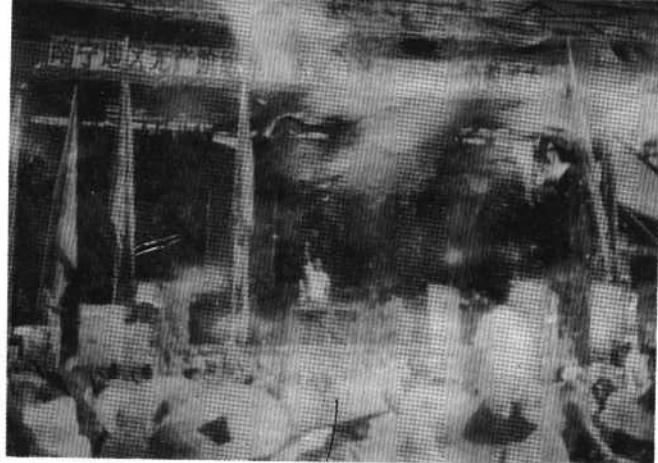


图14. 1967年8月1日广西“联指”造反派把贺希明、霍泛从北京押回南宁批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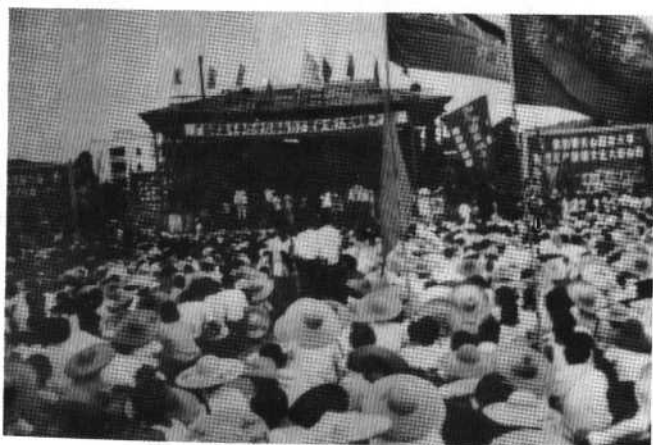


图15. 1967年8月1日广西“联指”造反派把贺希明、霍泛从北京押回南宁召开大会批斗后，2日又在南宁市主要街道武装押送游斗。





图 16—17 1968年1月间在自治区体育馆和区人委礼堂批斗所谓“伍修集团”。从此，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押送到全区七个专区、四个市和32个县进行巡回游斗。

图18 1968
年5月30日“4.22”
造反派化装解放
军攻打区林业厅，
炸毁办公大楼。



图19 同上
述时间区林业厅
有一栋宿舍亦被
炸毁。



图20 1968
年5月20日，广
西“四·二二”
派与“联指”在
华强粮店发生冲
突，双方在武斗
中六人死亡，三
人受伤，粮店的
一角被炸塌。





图21—22
为1968年7月15
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
区体育场召开“誓
死捍卫《七·三》
布告”大会的场
面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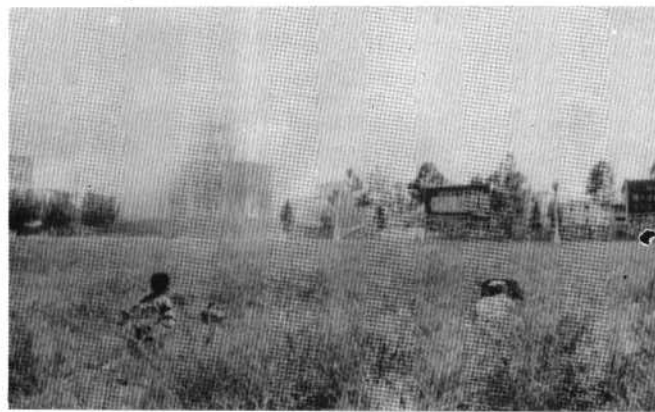


图23 1968
年7月16日，广
西“4.22”控制
的解放路、灭资
路（民生路）、上
国街、博爱街和
南宁市百貨大樓
等据点，被“联
指”炮击。图为
百貨大樓被炮击
的情景。

图24 1968年7月17日，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4.22”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图为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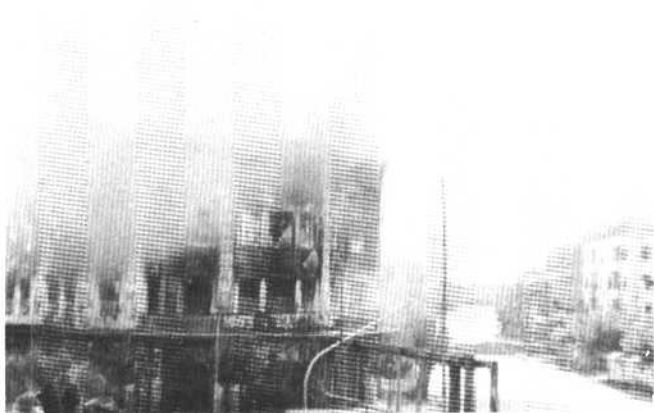


图25 1968年7月18日解放路与新华街交界处几十家商店被烧，灭资路（民生路）银行、三合馆、朝阳百货大楼和上国街、自强路多处民房也起火。一片硝烟弥漫。



图26 为“4.22”航运“工总”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桂宏号等船只被“联指”炮击。





图27 1968年7月31日
“联指”围歼“4.22”展览馆
据点。图为展览馆起火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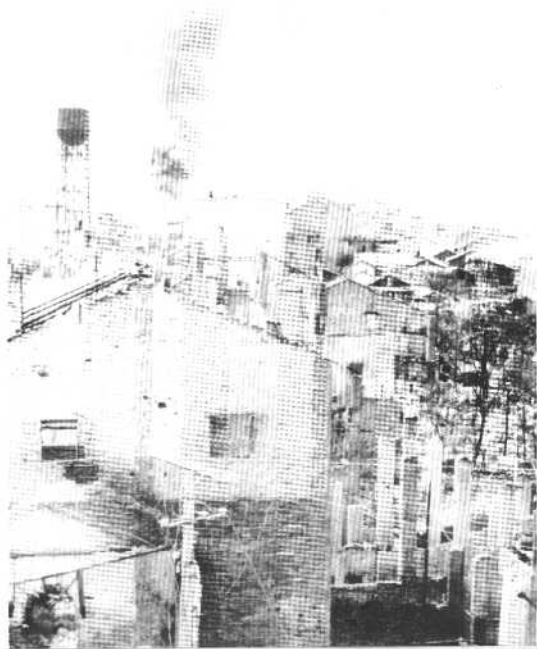


图28 1968年7月18日
“4.22”所控制的几条道被
“联指”炮击和双方交战时
互相投放汽油瓶而起火燃烧
情景之一角。

图29 1968年8月1日“联指”围歼“4.22”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时结束。图为被“俘”部份人员。



图30 两派对打时在解放路被抓获和击毙的部分群众。



图31 1968年8月5日“联指”攻打“4.22”控制的解放路。图为被“俘虏”的部份人员。





图32 1968年7月间“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在全区广泛开展。群众在跳“忠”字舞。



图33 幼儿园儿童跳“忠”字舞。



图34 群众刺绣毛主席像。

图35 1968
年8月26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革命
委员会宣告成立。



图36—37 为
庆祝自治区革委会
成立举行盛大游行。



前 言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文革”期间，“左”的思想泛滥，派性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践踏，许多地方一度乱打乱杀频繁，数以万计的群众死于非命，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批斗、审查、关押，蒙受不白之冤，长期遭受迫害。甚至身残命丧。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搞晚了一些，以致影响了工作重点的及时转移。一九八三年春，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调整了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和领导全区各族人民全面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随后又把这项工作纳入整党结合进行。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中央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共

同努力,对我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妥善处理了“文革”中打死人的问题,对死者予以平反昭雪,并做好其遗属的善后工作;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稳妥地清理了“文革”中混进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纯洁了党的组织。由于彻底否定了“文革”,坚持了党性,清除了派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全区实现了安定团结,为改革开放,为发展经济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的工作已于一九八五年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和类似“文化大革命”动乱形式的再发生,以此教育青年和子孙后代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目的,我们编写了《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一书,以期望人们从中得到教益。

全书系统地如实地记载了1966——1976年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者和决策者,关于开展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会议决定、指示、通知、报告,两大造反派批斗所谓“走资派”、武斗等活动,以及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极其严重破坏的主要事实。它是广西“文化大革命”真实历史的写照,是中国这场“史无前例”大浩劫、大灾难的缩影。

参加编写此《大事年表》工作的都是当年参加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和从事整党工作、档案工作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他们对这些历史资料都作了认真整理、鉴别,同时在编写过程中还征求了许多老同志的意见。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和条件所限,本《大事年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一九八九年五月

1966年

5月

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通知》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随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本月中旬,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部署,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进行批判,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展开。

19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系科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和讲师等知识分子首先受到冲击,有些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6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并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煽动学生把矛头指向各级学校党委。六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有少部分学生贴出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学校党委也组织另外一部分干部、学生贴出保护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这样学校开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5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成立了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段纯和（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14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或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文化部门、文艺团体、广西日报社。进驻各大学的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院、校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纪录片。工作队的进驻，使学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上级党委，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首先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15日 《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批判陆地著的《故人》，攻击《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自治区党委把陆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划为所谓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代表人物，布置各大专院校和文化宣传部门进行上挂下联，开展大批判。

28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党内外的一切职

务(当时陆地是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文章,攻击陆地著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30日 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二百多人,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运动。他们接到北京信息,要求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团没有批准。中央民院师生就在原县委第二会议室揪斗四清工作总团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莫矜,说是造“走资派”的反,在三江县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四清工作团组织赤卫队保卫机关工作秩序,以致发生围攻中央民院师生现象,并设立关卡,不准他们离开三江县到北京告状,事情搞得很紧张。为了解决矛盾,自治区党委派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傅雨田到三江县处理,宣布罢莫矜的四清总团书记的“官”,但仍受到中央民院师生的围攻。自治区党委再派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安平生到三江县对中央民院师生进行劝说无效,致使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中央民院师生又会同三江县中学部分学生揪斗县中学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赶下台的干部也组织起来造反。四清运动被迫停止。当时中央民委肯定中央民院师生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中央民院师生造反劲头更大,他们回北京组织红卫兵,到八月二十五日又重返三江,在三江县城成立造反“联络站”,到原县委门前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要求平反。三江县四清工作团全面撤退后,中央民院师生还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揪斗原四清工作总团书记莫矜。十一月底自治区党委作出了“三江事件”的检讨和处理意见。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三江事件”。

7月

3日 《广西日报》发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和文章，在这一天，南宁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开会，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讲话，要求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4日 根据中央《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的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内各大专院校工作队先后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本校工作队队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尚持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作同样的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对各大专院校由派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

1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

《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广西，无论是“文革”开始时的自治区党委，还是“三支两军”领导机构、自治区革筹小组、自治区革委会以及随后成立的自治区党委，都执行了“文革”那套“左”倾严重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广西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7日 驻广西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广西师院)工作队于本月五日撤出学校时，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便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外一部分学生揪斗当事者，开始是辩论，后来形成武斗，打伤了十几个学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桂林“八·七”事件。当时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肯定红卫兵“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师院多数派学生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于是“造反”劲头更足，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广西医学院的学生就自动组织了三十多人的队伍前往桂林支援师院的学生，这样很快形成桂林的多数派(后来称谓为桂林“老多”)。

八月上旬至九月，一些地市对小学教师进行集训搞“文化

大革命”，以所谓“纯洁教师队伍”，在集训期间有不少教职员工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等罪名受到批斗。

10日 广西师院学生就“八·七”事件，派出代表赴北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于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回到桂林。在桂林市召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第二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

17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电报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十八日宣布撤销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文章。次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道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的消息和文章。报社职工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

18日 广西师院学生和南下串连队学生拉徐为楷戴高帽游街，这次给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在广西是个先例。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有桂林市委领导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决定出动桂林步校师生对付那些学生，并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使对立情绪更加激化。

同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南宁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把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说南宁市很多街道名称都属于“四旧”。如兴宁路、民生路，改为兴无路、灭资路，一些楼房商店改称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把古老刻绘花纹的建筑、文物商店陈设印有花卉、古老图案的物品以及邕江大桥有凤凰浮雕的栏杆砸毁。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曾出现这种情况。红卫兵还到农村串连，破“四旧”运动波及了全区。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南宁市红卫兵集中抄家共六百七十多户，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五千多人，查抄所谓“封、资、修”等物品十五万件。贵县在破“四旧”中使南山寺和东湖游览区的太平天国翼王亭、石达开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等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在破“四旧”中把文物当作“四旧”，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19日 南宁市二中高二乙班成立“班级红卫兵”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成为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南宁市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先后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一千多个战斗队，人数发展到一万多人，成为南宁第一支红卫兵队伍。

本月中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前后三批共三百一十九人来到南宁市进行“革命串联”。走上街头横扫“四旧”，鼓动“造反”和揪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区、市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从此，各系统、部门、单位、学校竞相揪斗，给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戴高帽、剪头发进行游斗。

21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把全区“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25日 上午,南宁市二中、三中、广西大学等六间大、中学校红卫兵联合组织成立第一个“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在红星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提出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倡议。晚上南宁市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表示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3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到首都的五十万红卫兵和群众。广西一批红卫兵开始免票坐火车串连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9月

3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广西大学贴出《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要求西大广大师生员工炮轰司令部(自治区党委)。

5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外地高、中等学校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广西各高、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公费大串连。从此,我区红卫兵运动达到了高潮,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8日 广西师院学生两千多人宣布在桂林市委门前静坐,进行绝食斗争,并派二十五名代表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

愿。要求自治区、市党委进一步处理桂林“八·七”事件。

9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市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前来支援“老多”代表，并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结果前来参加静坐的红卫兵不断增加。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卫东”的女学生处在半昏迷状态，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出来探望，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这位学生即把他的手挡开，另一个女学生则把他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岗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口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了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并很快在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大字报，说他被打伤住院，要揪出凶手。随之很快传遍了广西，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这位领导人出来澄清事实，这位领导人于十月十八日晚在南宁桂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很快平定下来了。

20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贴出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对广西地方戏《刘三姐》和主管文教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进行批判。伍晋南坚持说《刘三姐》是好戏，但是很多造反组织揪住伍晋南不放，勒令伍晋南作检讨，广西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造反组织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从此，伍晋南成了众矢之的。

10月

本月上旬,广西红卫兵造反总部(以下简称“广西红总”)等红卫兵组织在南宁召开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勒令伍晋南到会答复。由于轮流揪斗,伍晋南感到疲倦不堪,难于应付,向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提出说:这里开大会要我去,那里开大会也要我去,我吃不消,我负不起这么多的责任,请求辞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长的职务。

11月

16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拟了一个计划,拨了大批款和粮票给外出串连者,凡是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是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补助人民币七元,四十五斤粮票,还给参加“长征”的一些红卫兵发了一套军服和铺盖,这方面开支花费了人民币三千多万元。当时到处设有“联络站”、“接待站”,自治区党委食堂也曾一度成为“接待站”食堂。自九月份以来红卫兵到北京等地进行串连,搭车免费,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

12月

3日 南宁市橡胶厂、标准件厂等六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代表熊一军、梁柏松等二十人，经过串连、筹备，于朝阳广场宣布成立“南宁工人造反总部”（后改为“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

8日 由南宁红卫兵“总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发起，在区体育场召开约十万人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由区党委主要领导代表自治区党委作检查，承认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1967年

元月

1日，《广西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号召下，广西继去年学生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岗位，外出串连。南宁市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愈演愈烈。

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震动很大。

5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一月四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恶浪，加剧了局面的混乱。

7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广西日报社“硬骨头”等十九个战斗组及“广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广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桂林‘八一’红卫兵驻邕联络站”等组织联合发表《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书——彻底揭发和批判〈广西日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并组成“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布《封闭〈广西日报〉通告》。《通告》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成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广西，“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据查就有几百人。

15日 “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造反大军”）。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造反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自治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

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十六日《新闻报道》出版，由“广西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

19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老多”在两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斗韦国清和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拉去陪斗的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和自治区党委派往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韦国清等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领导干部被强迫下跪。会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袖章缝制的衣服，给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

元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全国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造反组织在桂林联合发起成立“斗争陶铸筹备处”，积极进行诬陷陶铸的各种活动。

21日 晚上十二时，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园会议”，传达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以“工总”为主体的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

同日“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南宁市组织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有伍晋南、钟枫（区人委副主席）、尚持（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吕集义、阳太阳等二十三名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载在十几辆汽车上，在全市主要街道进行游斗。

23日“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的头头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驻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等。

之后，各地、市、县层层被夺权，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产队和街道居委会也被夺权。从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24日广西军区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各地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的“革命左派”，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当天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广西军区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25日广西《新闻报道》发表所谓《只准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社论。是日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盾牌红卫兵总部”。

26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召开所谓夺权胜利大会，驻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

26~28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五批部队共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南宁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持“造反大军”。

28日 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

本月下旬，“造反派”夺权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各级领导干部几乎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和“保皇派”被抄家、被打、被抓，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元月二十九日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自治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

29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31日 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

2月

1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两面派陶铸》的大字报。

2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达南宁，当晚受到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接见。记者直接插手地方的“文革”活动，对搞乱广西区党委，起了很坏的作用。

3日 “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

4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三司”负责人和“倒海翻江”头头等人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贴贺希明的大字报在区党委书记中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此后,他积极在群众组织和上层领导活动、串联,反复鼓动区党委、区人委个别领导干部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该记者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运动中因“文革”中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已受到纪律处分。)

5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院内贴出《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11日 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

12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原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拘留黄云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对黄云拘留是完全错误的,是冤案,并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3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区党委“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战斗团、“广西

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桂林“老多”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二日，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部分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

14日 上午，广西军区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肯定“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军区负责人在广西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15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6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的，没有资格开这种会。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是为了捞“稻草”，因而组织二百多人，冲击大会。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院开会，着重交换对“造反大军”的看法，并研究如何帮助“工总”整风问题。

本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八日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老同志。并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在广西，三、四月间“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甚嚣尘上。

19日 自治区党委一些负责人及部、委、办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

20日 广西《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

21日 区党委“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成立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

22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突然袭击“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其余人员也都放回。“无联”此举，引起社会舆论反对和内部分化。

同日 “工总”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议。“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

参加了大会,但这几个组织头头因不同意熊一军出面主持会场而退出主席团,也未在会上发言。

25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二十三日集中,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应支持“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工总”,清除坏人。

27日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指示,广西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领导、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等四百多人。

二月以来,广西军区和驻军向自治区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了“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3月

1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等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造反组织约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揭发控诉“工总”罪行。指责“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起来“造反”,封闭了“工总”总部,并将“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同年八月释放)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原“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

会。会上分析了形势,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

4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组织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工总”。

同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广西《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司”宣布退出“无联”。

6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通知》,《通知》说:军区党委经过和各方面协商,决定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广西抓促指挥部”)。抓促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何纪元(广西军区)、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〇分部副部长)、贺希明、李殷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此外,还有十三个委员,由军区、自治区各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

《通知》下达后,各地、市、县也先后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7日 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11、12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广西大学“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和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

12日 广西军区从三月十二日起,派出军管小组,对柳

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同日 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组织近四万余人参加，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的大会。廖炜雄主持会议。

13日 “广西工总”的二十三个分部一百多名负责人在南宁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

同日 “八·一八”红卫兵(简称小八)同“广西一司”就砸烂“工总”问题，在朝阳广场举行辩论会。“小八”认为“工总”应该砸烂，砸得好，“广西一司”则反对。

同日 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14日 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军区。十七日，接周恩来指示，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同日 南宁市中、小学校师生七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18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

19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20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分区接待组。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共五个组。

21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

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一十七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亮相。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次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随之，不少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了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

23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包括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南宁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除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外，其余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

25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造反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组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等口号。会后进行游行。

25日 《广西日报》实行军管后恢复出版。

军管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并以报社全体职工、干部的名义发表了告读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新生的〈广西日报〉而奋斗》。

同日 “南宁八·三一”负责人向广西军区提出：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韦站出来我们同意，但现在不是时机，要军区慎重考虑。

26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区直属机关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烽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兵书》。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原“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广西大学“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坚决反对砸烂工总”,“坚决打倒韦国清”。会后游行。

30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广西大学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指责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

是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是日 晚上,“汽司”、“铁司”(即“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

司令部”)、“建司”等工人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

三月下旬以来，经广州军区赴桂工作组和广西军区做工作，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也有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干部坚决反对韦国清站出来，形成了两派的观点。

31日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广西大学“狂飙”、南宁二中“井冈山”、“东方红”等十六个组织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少部分人共四百多人，晚上在南宁举行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游行队伍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曾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的成员发生冲突。

4月

1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革命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号召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复课闹革命，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个组织三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征求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与会人员批评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

11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组织说：“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反革命复辟逆流来自军区”等。连日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

语。是日一些造反者又发出“最最紧急呼吁”，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充当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吹鼓手。

13日 晚上“工总”及“打韦”派的学生、机关、干部各造反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

14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了同样的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一个“勒令”。

16日 上午，“打韦”派七十多个“造反”组织七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声讨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后游行。“工总”所属成员游行至文化宫时，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并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

与此同时，游行学生千余人，到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所谓“控诉《广西日报》罪行大会”。并有人冲上报社传达室房顶，把广播喇叭砸烂，冲击者广播了第二号“勒令”，提出要在《广西日报》上开辟专栏批判军管的《广西日报》的“罪行”。

17日 晚上，六百多群众到广西日报社向军管小组送“最后通牒”，限令军管小组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广西日报社，并在报社门前举行游行示威。

18日 “支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

同日 南宁很多群众纷纷到广西日报社声援,表示坚决维护军管的《广西日报》,报社内一些群众也发表声明支持军管。

19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三位负责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同日 南宁一中召开红代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受到“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约五百人的冲击,使会议中断。二十三日红代会再次举行会议,医学院“闯”、二中“井冈山”、“南宁八·三一”及部分机关干部共四百余人再次冲击,发生武斗。

20日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一千五百多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四·一九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

与此同时,区党校“红浪”和有关红卫兵组织头头分别在区党校、区文化大院开会,讨论把对《广西日报》的斗争升级,为支持《四·一九声明》造舆论和争取更多的领导干部站出来等问题。

同日 “支韦派”四百多个造反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斗争矛头指向《四·一九声明》。

22日晚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支持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倒海翻江”、“红浪”、“南宁市红卫兵联络

站”等组织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示威时，向报社提出六点要求，军管小组不予答复，他们便宣布静坐，并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静坐期间，南宁市和区内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声援静坐或声援军管《广西日报》，桂林等地“支左派”数百人还纷纷到南宁参加静坐斗争。静坐人员至五月三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电报敦促下撤离。

23日“支左派”四百多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批判《四·一九声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在会上揭露批判《四·一九声明》。

同日 广西“四·二二”派“汇报团”赴北京。

26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

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广西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广西军区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口号。

27日 下午，“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组织约五百人冲入广西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随后，“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声援广西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大会”。

28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四月二十七日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犯了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尊严，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严重地违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

促生产’的战略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社的正常革命秩序”，“冲击新生《广西日报》的一切组织和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冲击军事管制的广西日报社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冲击的操纵者负责”。

29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贫下中农百余人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明天斗争乔晓光大会。伍晋南接见了他们，西大“革联”组织数百名学生把贫下中农包围，将伍晋南抢走。“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集合一千多人前往西大声援农民，没有发生武斗。

29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共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的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广西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以及砸“工总”问题等。

30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关于各革命组织派代表到北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军区当即派人通知各有关组织。

同日 “支韦派”各组织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罪行大会”。会议由“郊区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发起并主持。会议勒令乔晓光、伍晋南到会接受批斗，但两人都未到会。

4月底 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流毒甚广。

5月

1日 广西军区接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电报，指示进驻广西日报社及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学生立即撤离。下午，军区向静坐学生传达。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乔晓光、安平生乘坐六次特快列车赴京。“支伍派”十二名代表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未去，说此次进京汇报很重要，需要很好准备，提出推迟两天赴京。

2日 进驻广西日报社和在门前静坐的学生于下午四时撤离。撤离前“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指出：军管小组必须立即改组，立即组织造反派参加的版面小组，并重申“四·二二”“四·二七”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晚上，“支伍派”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

与此同时，“支韦派”组织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召开庆祝空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遭到“支伍派”学生和工人冲击。

3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支伍派”代表十二人，乘车去北京。

4日 晚，“支伍派”约五千人，“支韦派”万余人，分别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四十八周年大会。“支伍派”会后演出打韦节目。“支韦派”会后则举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进行“慰问”活动。

同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表明军管小组对中央文革“四·三〇”来电的态度，并肯定说，新生的

《广西日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今后将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红卫兵联络站。

6日 “红色监察”、“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造反组织在南宁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

8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会上确定整军区的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10日 “支伍派”各造反组织三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坚决打倒刘、邓路线，彻底为‘工总’翻案大会”。

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联合在“四·二二”指挥部搞“兵训”，为期三天，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集训其间主要讨论研究：①为什么要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②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③“工总”问题；④总结静坐的成绩和教训；⑤如何摧毁“保守组织”；⑥如何下厂、下乡宣传，争取工人、农民的支持等方面的问题。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

11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造反组织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头头，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头头。

12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二中“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13日 晚八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的罪行。

15日 “支伍派”学生千余人又在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彻底清算《广西日报》的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强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严正声明》。

22、23、25日 “支伍派”学生造反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南宁一中“指点江山”、南宁三中“血战到底”、南宁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

24日 “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标语。

25日 上午十时，“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区、市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召开“抗议《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罪行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十一时五十分，游行队伍将广西日报社重重包围，并分三批二百余人以送版面小组为名冲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封锁报社前后门，并宣布对报社实行“兵管”。十二时二十五分，冲击者派出代表与军管小组谈判，提出：①石勇、杨仲绪（两人为军管小组负责人）等必须滚蛋；②版面小组必须由我“革命造反派”组成，“保守派”靠边站；③

报纸只准登“造反派”文章，“保守派”文章一律不准登载；④《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必须在报纸上开展批判。

同日“支韦派”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以与“四·二二”相对抗。

从此，不同观点的各造反组织便分别汇集阵线分明的“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和“五·二五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互相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派斗”。

同日 下午六时左右，“五·二五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四·二二”派进行辩论，并要他们立即撤离，并动手企图强行把他们拉出去，以致双方发生了以石头、木棒等为武器的武斗。晚八时以后，双方来支援的人已达五、六千人，武斗越来越严重。广西军区派出七辆宣传车到现场宣传，呼吁双方停止武斗，并派救护车抢救伤员。至二十六日凌晨，武斗渐渐平息，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26日 上午七时，“五·二五指挥部”千余人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必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等口号，从广西日报社后门冲入报社。进入报社后，把包围在电台、印刷厂的“四·二二”派人员强行赶走，后双方争夺办公大楼，引起大武斗。武斗持续至下午四时因雨停止，双方受伤百余人。

当晚七时，“五·二五指挥部”人员主动撤离，“四·二二指挥部”大批人马再度开进报社，占领电台、印刷厂和办公大楼。

同日 下午，曾春生主持在北京的“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决定晚上行动，去京西宾馆静坐和揪韦

国清，并成立了阵地勤务组。晚八时左右，静坐队伍到韦国清住的窗口下去喧闹。次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同志到京西宾馆向“阵地勤务组”的头头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该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但遭到拒绝，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这次静坐历时四天五夜。

27日 上午，“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随后组织千余名工人、学生等冲进报社。十一时，强行进入电台、工厂，切断电源，使正在印刷的当天报纸中断，并将已印好的报纸扣留，不准发行。当晚，军管小组发表第四号《声明》。

28日 “四·二二”进驻《广西日报》后，强行出版当天报纸，发表夺权《声明》，给毛主席致敬电及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等。

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

29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公开指责“四·二二”造反组织。部队领导机关正式对一派造反组织发表“警告书”，震动很大。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勒令“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在三十日凌晨五时撤离报社，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30日 凌晨五时，支持“四·二二”的七十名领导干部给中央文革发电报，说南宁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引发了武斗。五时三十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斗。

同日 上午，南宁郊区贫下中农九千余人进城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坚决粉碎夺《广西日报》大权的反革命行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本月下旬，区党委组织部造反组织“东方红”，根据“五·二五指挥部”的安排，动用本部公章开外调介绍信，派人外出调查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和后补书记霍泛等人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对霍泛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长期受迫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6 月

1日 晚上十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这次接见主要是听取广西两派的意见。

2日 “四·二二”派在南宁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大会”。

“联指”派也同时开大会，拥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是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继五月二十九日之后，又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被迫撤销这一《通告书》，并向“四

· 二二”道歉。

同日 “四·二二”部分组织的头头在区党校开会。会上讨论研究了《广西日报》和广西军区的问题。决定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培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揭批韦、乔问题等。按专题分工专人写，并反复强调，这五份材料，都要与广西军区挂上钩，点出军区是后台。

4日 晚十二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简称《六·六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下达后，广西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仍继续发生。

7日 “广西联指”头头从北京给南宁打电话，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所谓材料传到南宁。“联指”以“北京来电”形式组织连夜翻印、散发全区，致使霍泛在政治上、身心上受到极大的迫害，亲属受株连，“四·二二”群众也因此受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10日 上午九时，“联指”派一百二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八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会，庆祝“南宁大、中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广西军区派人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11日 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带有“四·二二”出版的《广西日报》到柳州，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双方发生争吵，司机说被打伤不开车，柳铁“工机联”以此为理由向柳铁军管会提出“交出打人凶手”等条件，不答应不开车，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六月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

柳州“四·二二”数百人以没交出凶手为由，坐在铁轨上拦截列车开出，并用机车堵死咽喉道岔，致使沿站所有列车不能运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下，此事才得到解决。六月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

本月1日至12日“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员，又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南宁警司《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为“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丑化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在此期间，“支韦派”组织成千上万人马，也纷纷集会，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

13日 南宁一中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长期离校不参加军训的一中“四·二二”派“指点江山”学生三、四十人于前两天回校，十三日上午宣布要在校内搞“兵训”，占据了军训团宿舍，西大“革联”亦来十多个人，说是来指导“兵训”，要进驻一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的反对，从而发生争执和小冲突。晚八时左右，“四·二二”在朝阳广场“造反楼”广播说，一中“指点江山”被三百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五百多人闻讯赶来，封住一中大门。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中一些人的围攻，紧接着用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守卫大门的红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卫兵团”进行反击。不久，“四·二二”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也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十四

日凌晨五时，“四·二二”撤离，武斗告一段落。八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又重新将一中包围，由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桂林“老多”二百多人向一中大门冲击。九时许，“新工总”、西大“革联”又来几百人，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联指”派的铝厂、化工厂和橡胶厂约四、五百工人，也前来支持。武斗持续至十五日上午结束。

这场武斗，使一中校门前街道两旁居民房屋天盖毁坏严重，一中教学仪器房等亦被毁坏，折合经济损失五万多元。双方各被打伤二、三百人，重伤住院一、二百人。南宁市一中“六·一三”武斗事件，揭开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4日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参加了接见。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四·二二”和“联指”都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5日 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敌伪档案材料，诬陷霍泛是叛徒，并诬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组成反革命联盟”，还诬告谢王岗是特务。周恩来对“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及干预“四·二二”群众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同日 南宁市一中“六·一三”事件后，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当时，“四·二二”派说专政机关放劳改犯出来参加武斗等，扬言要血洗永宁公安分局。六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三十分，围攻坚持正常上班的永宁公安分局和永宁派出所的干警，将永宁公安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和永宁派出所指导员余雄活活打死，所长何绍芬等十四人被

打伤，其中八名公安干警被打重伤，六人轻伤，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材料被烧毁。

同日 上午，南宁市郊区“联指”派一些组织的头头开会，会上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联指”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会后于十六日采取行动，进城的农民配合南宁“联指”围攻“四·二二”据点航运“工总”、文艺干校等地。“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农民六百人（后增至二千多人）围攻航运“工总”北大码头仓库，造成大量伤亡，国家物资损失严重。

16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改成只登新华社电讯稿。

18日 广州军区决定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葛冲等为军管会负责人。

同日 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

18、21日 “广西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进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部署，准备攻打文化大院。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负责人主持召开区、地、市“联指”常委及各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所谓“加强团结，迎接自治区革委会诞生”。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组织了一千多人再次进攻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持续数天未攻下，后撤回。

24日 广西“联指”调动工人及南宁市郊区农民包围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大楼，清晨开始攻打。当晚，设计院工人蓝展在逃跑中，被“联指”人员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火种”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六人被关押挨打，

大楼上“火种”的广播器材、探照灯及“文革”资料被抢走。“火种”成员龚华健被汽枪击瞎一只眼。

25日 上午，“联指”在区物资局二楼设立指挥部。下午五时许，“联指”派即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七时许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四·二二”、“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

26日 “联指”从粮食厅方向继续攻入文联大楼，将“四·二二”人中全部压缩在新礼堂内。天明后武斗停止，“四·二二”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联指”攻占文化大院后，有的乘机报复，有的借机打劫，许多门窗被砸坏，财物被盗，不少人被打。

在“联指”攻打文化大院的同时，还包围了广西日报社，冲进报社大院，攻打工厂和办公楼，区邮电局“抓促指挥部”同时下令停止展览馆和文化大院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传来后，“联指”下令撤走围攻报社的队伍。

29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康生、戚本禹等陪同接见。这次接见主要听取“四·二二”代表的意见。周总理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武斗作了重要指示。

7月

本月初 根据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在北京两派谈判期间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中央文

革记者站记者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2日 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广西军区负责人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开“联指”头头和南宁市委数名领导干部座谈会，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研究。

同日 广西军区“支左”负责人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

4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广西军区以明电和电话发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 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 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 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
4. 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 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 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 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8. 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 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 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

同日 中午，“联指”撤离在区人民医院、南宁市工农兵饭店和航运局等生产营业单位的据点。

7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能闯”、广西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头头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人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联指”方面提出，双方派出三至九人组成，“四·二二”方面认为“联指”的提议是非法的，并提出双方派出二十人组成监督小组；并说广西军区无权召集他们协商这个问题，应由南宁驻军来主持。

8日 “联指”又撤离集结在区文化大院、中华电影院、南宁市委、市一中、四中、西平桥食品店、市粮食局、红卫医院、桂南酒家、民族电影院等据点人员。

10日 广西军区三次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举行监督小组筹备会，就监督小组名额、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后因“四·二二”方面提出要桂林“老多”派代表参加的问题而未达成协议。

同日 下午三时，“四·二二”开始撤离朝阳百货大楼据

点人员。五时三十分，“联指”全部撤离集结在朝阳旅社据点人员。

同日 “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

11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指挥部，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12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站转发“关于开展对原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文件。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木棍、石头对打，至十三日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多人。

1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

同日 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六九八四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六〇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

14日 晚上，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军区支左工作有关问题和制止北海武斗问题，并学习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

15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成立“广西地区批陶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指示等问

题。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及军区贯彻这一指示的意见。

16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准备先给王荔谈，再要求给戚本禹谈。王荔没空，叫他们先写信给戚本禹。晚上，代表团讨论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

同日 上午，军区负责人在南宁召集“四·二二”常委和“南宁八·三一”、“八·一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四·二二”代表表示：坚持不能和“联指”坐在一条凳子上。

下午三时，军区负责人接见区党委、区政府各部、委、办、厅局负责人，谈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何防止武斗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来南宁的桂林“老多”骨干就归口闹革命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同日 晚九时三十分，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召集“四·二二”和“联指”双方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进行第六次谈判。

七月中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记者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于七月十七日，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每日动态》上。

17日 被“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载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6955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训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二”等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广西分社内，对总社昨晚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新华社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打了新华社广西分社的人。新华社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同日，新华社总社给广西分社来电，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师院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社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

18日 在北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的记者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八份材料。

同日 上午七时，“联指”近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陶誓师大会”，广西军区派代表参加并讲了话。

十时许，“四·二二”二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造反楼”

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指责“联指”冲击新华社。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原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了关于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发言，声讨所谓陶铸的“罪行”。

19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队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会上因“四·二二”代表坚持要桂林“老多”参加监督小组，“联指”反对，引起争吵，未达成协议。

鉴于上述原因，双方要求广西军区提出意见。军区提出：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其任务是：①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②解决、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军区召集双方代表，对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

23日 在江青七月二十二日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上海《文汇报》当天公开发表这一口号，煽动武斗。从此，广西和全国一样，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24日 根据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成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

26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在监督小

组安排下，两派在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

8月

1日 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后，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策划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在贺、霍被押上飞机起飞后，他们才向周总理报告。贺、霍被送到广州时，周总理电告把贺、霍送回北京，他们不听，仍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八月二日，“联指”派七十部汽车在南宁武装游斗贺、霍。在周总理一再追问下，令“联指”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才于八月十一日把贺、霍二人送回北京。

4日 “联指”调动上万武装人员的队伍，到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并围攻区文化大院和区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联指”头头亲临指挥。“四·二二”坚决还击。这次武斗使用了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等，双方伤亡严重。

7日 “联指”发出所谓“通缉令”，“通缉”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诬蔑他是“国民党大特务”。

9日 “联指”红卫兵等组织夺占广西日报社，并继续围攻展览馆“四·二二”据点。“联指”夺了《广西日报》后，并不交给军管小组，却于十日自行主持出版《广西日报》。

同日 上午，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曾春生等人，与广西军区个别负责人经过密谋后，下午，“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主持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具体讨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揪韦国清问题并决定行动方案，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于晚饭后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韦国清被推倒在地上，

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脏受损伤。伤势严重的留下后遗症。广西军区副司令徐其海也同时被围攻、辱骂、推打，并撕下了他的领章和帽徽，抢走了他的军帽。

11日 凌晨，周恩来来电，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社的“联指”人员撤离。驻军六九五五部队派队伍赶到报社，构成人墙，阻拦“联指”对报社进攻。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在报社工厂办报的人员撤离厂区，同时从工厂搬走部分机器、铜模、铅字和纸张。包围报社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五时，“四·二二”数百人冲进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副食品等。但由于报社印刷设备在武斗后遭到破坏，无法使用。“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在停刊十五天后，于八月二十三日改为油印出版，直到十月十五日止。

18日 晚十一时左右，“四·二二”头头经过策划，纠集了三百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四千多发。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四·二二”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20日晚上，“四·二二”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夺邕宁县武装部枪支弹药。邕宁县“联指”经请示地专“联指”，组织力量在良庆江面拦截。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拦阻不成。

同日 南宁“联指”指挥部，决定晚上攻打东方红医院（即原工人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四·二二”据点。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东方红医院武斗结束后，医院被严重破坏，死十人（“联指”一人，“四·二二”九人）。还有些“四·二二”人员被俘后在别处惨遭杀害。武斗后，“联指”把十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一具，共十一具，当作是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罪证，现场陈

尸展览。

22日 广西两派代表和军代表以及首都医疗队十六名医师，共同组成现场调查组，到东方红医院对尸体进行检验。

本月下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一名记者去找“四·二二”头头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提出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会被动，要早些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他们根据这个记者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决打倒；二是调出广西；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

23日 邕江大桥被“四·二二”武力封锁。“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四·二二”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南宁地专“联指”出动三、四百人，参与攻打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四·二二”据点。广西“联指”副总指挥指挥攻打邕江大桥。晚上十一点五分，攻打邕江大桥“四·二二”据点的枪声，响彻夜空。

同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六九八四部队进驻“四·二二”造反楼、反修楼、展览馆等据点。

24日 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接见时谈话内容有：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外出人员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等问题。周总理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

五次接见后，“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以“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有的群众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有的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

同日 驻柳五五军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

2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29日 广西“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了九部汽车，到广西日报社仓库抢走大批卷筒纸，广西日报社职工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30日 在本月七日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的影响下，区公安厅“公安战斗团”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砸烂公检法”。

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孙凤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端、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

本月下旬，“八·二四”周恩来第五次接见两派后，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天天到“联指”人员门前寻衅，“联指”代表团在京呆不下，最后秘密分散回南宁。周总理知道后，叫秘书给广西军区打电话，要“联指”代表团回京，并派专机把代表团接回北京。

9月

3日 广西“联指”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红卫兵赴京控

诉团四十人乘火车于四日晚七时许到桂林南站时，遭到桂林“老多”和南宁赴桂的“四·二二”人员非法检查，将“联指”人员绑架二十五名，其余下落不明。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广西军区于上午七点半左右，向各军分区电话传达。

接着，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有些组织还继续抢枪。

从八月份至《九·五命令》前，全区抢夺部队武器的有十九个县、市。其中被“四·二二”抢夺的有桂林、临桂、灵川、永福、平乐、兴安、资源、象州、宜山、横县等十个县、市；被“联指”抢夺的有阳朔、玉林、武鸣、扶绥等县；两派都抢夺的有南宁、邕宁、柳州、梧州、柳江等五个市、县。

6日 广西“联指”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将抢来的枪支炮弹上交了一部分给广西军区。

8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

13日 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

接见的主要内容是：铁路要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桂林“老多”参加护路；“四·二二”要拆除工事；两派要封存武器等。接见中，周总理还指示广西军区负责调查和研究解决广西日报社印刷厂机器零件被盗走的问题。

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

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5日 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八十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7·62步骑枪八十支、轻机枪四挺、九二式重机枪一挺、五〇式冲锋枪五十支。

1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协议》签订后，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

22日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接见内容主要是谈大联合问题。

同日 柳铁“工机联”、“钢联指”，南宁“红色铁路”，南铁“工总”，广西师院“老多”等组织代表和广西军区，六九五五部队，六九七七部队等军队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保证广西境内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八条）。

24日 柳铁“钢联指”、“工机联”等造反组织代表和柳铁军管会代表，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九条）。

27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协助桂林“老多”执行任务的通知》。

28日 根据五次接见时周总理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广西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

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本月，驻区党委大院的广西大学“能闯”一些学生，抄了伍晋南、贺希明的家，抄去一批衣物、照相机、手表等物品。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全区各地出现大联合气氛，很多地、市、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南宁军民共约十五万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

本月，在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2~4日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受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

被依法逮捕，于一九八五年元月处决)。

4日 广西“联指”召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斗私批修高潮誓师大会”，并欢送广西大学“能闯”和“小八”、民族学院“三七”等组织的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

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在广西，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26日 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签订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共三条)。

同日 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二十八日，两派又联合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28日 北京来电传达周恩来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再参加护路。

31日 “联指”发出《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紧急动员令》。

11月

6日 自治区直属单位由“联指”“文艺批判联络站”主持召开“批判”《刘三姐》大会。

8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十条协议》传到南宁后，广西两派和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十二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表示拥护。

9日 晚十一时至凌晨一时，周恩来接见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及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杨杰等。

同日 “联指”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臭《刘三姐》，坚决打倒伍晋南大会”。

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

13日 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联合的协议》。

14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

同日 广西军区电话通知，各分区立即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十条协议”到各县，各县立即组织宣传队，印发批示向两派宣传，并深入到生产队宣传。

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中发

〔67〕353号文件《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决定》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决定》认为，韦国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批准了他的检查，毛主席也看过这个检查，并批示“照办”。

中央还同意安平生、伍晋南的各自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

二、中央同意和支持两派赴京代表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和《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并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

三、两派要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日 下午六时至八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黄永胜、刘兴元。

接见主要内容：宣读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晚八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伍晋南、安平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第一次会议。

23日 凌晨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两派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谈了几个问题：①关于两派问题；②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③关于《广西日报》问题；④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⑤关于干部问题。周总理指示代表团即日回广西。

下午三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和两派赴京代表团、各军分区负责同志等乘专机回南宁。在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及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2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问题。

26日 凌晨，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被来南宁的桂林“联指”和广西“联指”的部分群众拉到“建司”。要求郝忠云签字制止武斗。后经军区派人前去劝说，下午二时后送回。

下午三时，自治区革筹小组韦国清等七人在军区礼堂接见南宁三支两军全体人员和军区机关干部，魏佑铸宣读了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本月下旬，广西军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

27日 下午和晚上，韦国清召集革筹小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

会议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未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要回来；农民进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由本组织自己抓；《广西日报》仍要军管，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

28日 根据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农民代表进城(桂林市)慰问“联指”的情况，欧致富、魏佑铸指示：今晚立即给桂林地区的荔浦、阳朔、恭城、全州等县武装部打电话，责成武装部要坚决说服、劝阻各县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桂林市的问题由桂林驻军与两派协商解决。

29日 欧致富、焦红光、王斌、魏佑铸、孙凤章，分别接见“联指”、“四·二二”部分常委，做关于伍晋南、安平生回南宁的工作。

30日 晚上，革筹小组开会，对柳州市武斗问题，经研究采取以下措施：

1. 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 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 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4. 四支队不介入当地两派斗争。

同日 “广西艺总”派出六人组成代表团，到天津参加方纪、孙振、白桦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

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十一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十一月中、下旬，各地武斗频繁，抢枪事件又不断发生。

12月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邕全体成员,分别接见广西两派组织的常委,做伍晋南回来的工作。并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大力宣传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抓紧上交武器、弹药工作,做好劝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黑手,克服派性;

三、地方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准参与支持和挑动武斗;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军队必须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做爱民模范,不能支一派压一派。

3日 “四·二二”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广西工总”成立一周年。

4日 下午六时,伍晋南、安平生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南宁。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王斌及驻军、两派代表百余人到机场欢迎。

7日 南宁两派群众在南宁朝阳广场联合举行“热烈庆祝林副主席为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

会”，会议由自治区革筹小组主持。

8日 革筹小组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的四点意见：①广西日报社两派联合起来，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共同出版，可先出电讯，也可以考虑发表两派同意的文章和革筹小组指定的文章；②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外单位人员要撤出，广西日报社内部人员要回来；③军管小组成员，可作必要调整；④《广西日报》军管期间有错误，有什么性质的错误呢？我们认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恢复军管办报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桂林“五四雄鹰”抢师范学院“造反大军”的枪问题。决定给驻军打电话：①不准开枪，不准抓人；②派干部进行劝阻；③枪支接管、转移。

12日 两派达成《关于联合开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学习班从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

同日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彻底砸烂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红色文化”代表在会上攻击诬蔑所谓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封、资、修、大、洋、古、高、精、尖等。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以明码电报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对监狱和劳改单位的二点指示》：1. 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2. 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 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14日 南宁地区工人革命大联合协商小组、“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发出《向全区人民紧急呼吁书》，坚决支持广西革筹小组《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

16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南宁两派和驻军在朝阳广场召开“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革筹小组六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革筹小组的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一、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三支两军人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广西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和《九·一三通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斗，消除一切武斗因素；三、不准抢夺武器，坚决收缴枪支、弹药；四、群众组织不准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已抓的人一律释放；五、农民不准进城武斗，城市和圩镇的人也不要到农村串连；六、民兵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惩治坏人；八、军分区、人武部、驻军要支左不支派，做爱民的模范等。但是，命令颁布后，各地乱杀人的事件仍接连发生。

19日 凌晨，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四·二二”造反大军赴邕“反屠杀控诉团”二百余人，到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

同时，各县“四·二二”“反屠杀委员会”向革筹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②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③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反动组织；④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⑤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

20日 军区负责人接见外地来的人员的代表十五人。他们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召开分区、武装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②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点部队去；③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④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⑤大量印发中央指示的三个“照办”。

22日 在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下和“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推动下，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下午，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十多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十五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财贸系统组织、手工业系统组织和大中小学红卫兵组织，区、市机关两派组织等，也纷纷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筹，促进了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

同日 晚十一时，军区负责人接见“联指”常委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的武斗问题。

23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问题。对水电厅、交通厅的武斗问题，确定了五条处理原则：①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②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③不准打架，不准动武，不准进行人身侮辱；④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⑤被抓的人立即释放。

24日 经中央批准同意，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

指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电告钦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命令立即停火，双方抓的人立即释放，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

同日 下午，革筹小组五名负责人到南宁专区参加所属的十三个县成立“大联筹”庆祝大会，其中二名在大会上讲了话。

25日 南宁两派红卫兵大联筹成立。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晚上，广西大联筹召开会议。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研究：①成立“大联筹”办公室；②派联合工作组到钦州地区制止武斗等问题。

26日 下午一时，各县“四·二二 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并讲了话。

“四·二二”成立了“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七百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了《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

同日 晚七时三十分，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对进驻军区的群众的工作问题。

27日 晚七时，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进驻军区的水电厅“红水院”的群众，解决制止水电厅武斗问题。

28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按车间、班组实行大联合。双方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

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区革筹小组以及驻军负责人等到该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和广西军区、驻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对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祝贺。

29日 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五十分，“四·二二”在军区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静坐长达十四小时。

二十时，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大联筹会，研究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问题。

31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至晚九时，区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四·二二”进驻军区的一千多名群众，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①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②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③凡因武斗进城的农民和其他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后果由挑起者负责。

同日 广西大学“能闯”向伍晋南发出“勒令”，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时前交出所谓“认罪书”，否则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968年

1月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骨干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强调要很好地学习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 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和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红卫兵头头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侮辱、折磨达两个多小时。

同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指出“联指”、广西大学“能闯”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伍晋南的行为要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

是晚，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组织红卫兵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军区负责人严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示威群众于翌日凌晨三时离开军区。

7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红色铁路”五百多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铁军管会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派王斌召见“联指”广西大学“能闯”主要头头等二十多人谈话，指出他们五日拉伍晋南到广西军区批斗是错误的。

11日 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在柳州被一派造反组织揪斗。

18日 灵山县“革联”头头率控诉团二百多人再次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县“联指”在五个公社成批杀害“四·二二”群众的罪行，要求军区制止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恶行径。控诉团在军区静坐。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的不纯，混进了少数坏人，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

20日 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分群众四百多人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四·二二”控诉团，在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军区负责人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本月中下旬以来，两大派的造反组织都企图采取武力镇压对方，摧毁对方，以夺取一派掌权，致使全区不少地方都发生大规模武斗。有的“造反派”调动民兵进城镇压所谓“土匪”、“反革命”，使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惨遭杀害。

2月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于上午、下午分别召见广西“四·二二”龙智铭等九名常委和广西“联指”颜景堂、廖炜雄等六名常委。要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①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有分歧须通过协商解决。②“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据点是错误的，要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进攻，撤除包围。③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立即回原单位。④要维护中央“九·五”命令，不许抢夺武器装备。⑤“造反大军”绑架县人武部长是十分错误的，要立即送回。

4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对敌斗争问题。讨论中有的负责人认为，应给“四·二二”增加压力。贺（希明）、霍（泛）揪出来后，伍（晋南）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分析说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简称“捍联站”），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

“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讨论时革筹小组还有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围剿派性的意见很好，当前敢不敢承认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对“四·二二”反映“三个照办”（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要求照办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全面上缴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不落实和遭到大屠杀的问题，我们应注意。有人则认为，当前有些群众组织的矛头还是指向军区。军区和各军分区过去一边倒（支持“联指”）是不对的。但他们早已开始转弯了，当然转弯并不容易。我们应该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军区系统。“四·二二”讲“三个照办”没有落实，我们要具体分析。“四·二二”当前提出的什么大屠杀，武装部指挥武斗等等，我们不能承认。由于会议上观点不统一，没有正视和及时采取果敢措施，致使各地已出现的大规模武斗得不到制止，成批杀人的事态愈演愈烈。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和专案组人员，听取他们汇报所调查“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专案情况。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一些领导人这样做，已陷入听信一派之言，错误认定某些人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不仅导致造成一批冤假错案，不仅派性得不到纠正，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广西各地中共地下党员惨遭严重迫害；许多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

10日 广西“四·二二”“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发表该报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文章指责当时柳铁两派达成的“倒旗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

和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破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得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做官”。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化了当时广西“四·二二”的内部分歧和广西两派的矛盾，影响了正在推进实现大联合的形势。

12日 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声明。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的情况》。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联合发布对自治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的布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宋治平任军管会主任。

1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积极促进各专、市、县革委会建立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田阳七〇二矿革委会成立，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队的一位科长担任。

本月中旬，自治区革筹小组召开全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后于二月二十日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镇压那些混进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此后，各地、市、县相继

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部分地区出现乱批斗、乱杀人的严重局面。

21日 广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驻南宁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队抢枪，抢得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六〇炮一门，受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指责，并勒令“四·二二”如数交回枪支弹药。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坚决维护军管军训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训”、“民管民训”、“工管工训”、“农管农训”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区体育馆召开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大会。区革筹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某些地区发生武斗，有人说是军分区、人武部挑动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的干部支持这派那派，这笔帐是要算的。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反映：（一）某些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二）进驻军区机关，干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挠部队调防。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四）抢夺部队武器。（五）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报告》提出初步打算：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教育群众同坏人划清界线；由区革筹小组领导人向两派群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调查研究，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

革命分子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工总”建工分部等组织“武装”冲击我执勤分队的情况的报告和两个连的武器装备被抢的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24日 广西“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25日 广西“工总”错误估计“联指”把抢来的枪支弹药藏在部队的油车运往钦州。“工总”所属组织就在南宁市友爱路拦截油车一辆，但没有发现有枪支弹药。

2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段时间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大部分于二、三、四月份陆续成立。

28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黄达升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四·二二”野战军。会上，黄达升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①支援各地“四·二二”抗击“联指”的大屠杀。②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③打击、清理混进“四·二二”的坏人。

2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

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3月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广州军区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退出群众组织的请示报告。

5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队回南宁“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6日 广西“四·二二”的“草上飞”第二挺进队又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当局调离六九八四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四·二二”。

7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

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

8日 广西“四·二二”撤出进驻广西日报社人员。

1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河池军分区、凤山县武装部发出同意凤山县部队进驻“联指”据点，保护群众的指示。

14日 《广西日报》恢复军管并继续出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十二名领导成员中，有谓地主分子一名、坏分子二名、劳管分子一名、投机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干部一名、有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的三名、杀父之仇一名。“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公开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五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说：“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六九八四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

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要其交出坏头头。

20日 百色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覃展(地委副书记、专员)、张吉亭(军分区司令员)、张平(地委副书记)。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说，广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和一个团)驻长安镇(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部队奉命进驻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从县城撤到农村，建立据点，企图保持力量。

27日 南宁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南宁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董以法(南宁地委副书记)、熊光武(军分区司令员)、李文轩(军分区副司令员)、伏崇礼(南宁专署副专员)。

三月下旬，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

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28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各界群众八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誓师大会。声讨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坚决拥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和坚决拥护对黄永胜、温玉成任命的命令》的报告。

2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和全区各地“四·二二”群众惨遭杀害有意见分歧，而发展为组织上分裂。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会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军区“保护”起来，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四·二二”参加区革命委员会。从此，广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两个组织。

同日 广西“四·二二”所属组织“邕江风雷”在南宁发表《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3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3月18日至19日，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召开形势座谈会，组织广西赴京“控诉团”。有四百多人于六月中旬上京后到京西宾馆静坐，要韦国清出来答复解决广西武斗问题。六月二十五日动员冲京西宾馆。“控诉团”静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军押回和平里办学习班。

31日 《今日的〈哥达纲领〉》的作者肖普云（柳州铁路中学学生、红卫兵）在柳州市被逮捕。

4月

1日 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农学院“革联”、广西医学院“闯野”、广西民族学院“红旗”等四个造反组织发表《关于韦国清问题的声明》。《声明》说韦国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到群众里面去，公开检查错误，接受群众批评。并指出：根据韦国清目前的情况，他还不宜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打算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4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反右倾、

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号称有八万多人。会上通过决议：①关于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员和赴京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②《关于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道南宁北岸砖瓦厂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粉碎敌人破坏阴谋》的消息。消息说该厂革委会的诞生，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的阴谋取得的“伟大胜利”。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报道说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帮助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洪流滚滚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提出要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同日 钦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曾俊德（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军分区副司令员）、林中（原钦州地委副书记）、阎庆身（原钦州专区副专员）。

6日 《广西日报》开展对《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批判。

7日 广西“四·二二”红卫兵五百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就是“派委会”。并就这个问题交送《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在《举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通栏标题下，刊登《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发黑炮弹》等四篇文章。

8日 广西“联指”三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口号是：“坚决拥护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正确领导！”“坚决支持南宁市革委会成立！”

同日 广西“四·二二”的“飞将军”发表《紧急声明》：①在广西的“庞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纵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谓南宁市革委会是抹煞“三个照办”，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办的派委会”。②坚决支持广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烂这个“官办的派委会”。③广西“四·二二”的红卫兵“四·七”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④不击退右倾老保的翻案妖风，誓不收兵。

9日 南宁举行干部群众大会。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作了《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痛击右倾翻案分裂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江青关于在革命的进程中，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当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右、“左”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讲话中还说，现在有人乔装打扮，蒙骗群众，诡称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企图混进革委会。如南宁“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中，公然扬言要“坚决抵制南宁市这个‘伪委会’、‘派委会’”，还诬说什么革委会的成立，就是要搞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北海市的“狂人”战斗队四月五日抛出一个反动的《论时局斗争的任务》。广西有人

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黑会”，广西文艺界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他们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进行反革命活动。要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们揪出来。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参加天津黑会和演黑戏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指出，现已查明广西参加天津文艺黑会的有关人员及其活动，广西话剧团“四·二二”所属的“东方红”排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导演是一个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对黑会、黑戏采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广西参加天津黑会的组织和人员。二、贯彻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发动群众揭批周扬的罪行。

11日 继九日之后南宁又举行群众大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并分别就“坚决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以整版报道连日来南宁群众集会《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和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批判贺、霍、傅、谢、袁的文章。在三版发表题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反革命逆流》的社论。在南宁连日来的群众大会和《广西日报》社论、文章的影响下，全区各地也纷纷集会，迅速掀起一个所谓“反三右”（即反右倾翻案、反右倾分裂、反右倾保守）的斗争，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

“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驻梧州部队武器被抢情况报告说，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联指”召开“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军冲击而引起了武斗，开枪开炮。部队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伤七人。十六时许，梧州“联指”分别冲击军分区、市人武部、分区独立营、监狱、看守所，抢夺一批武器和电台、服装等军用物资，还打伤五名战士。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纵他们，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与“黑手”、“坏人”划清界线。

12日 广西“四·二二”一万多人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口号是：“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毛泽东、林彪发出关于成立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报告。报告说有少数人破坏，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四·二二”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四·二二”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四·二二”野战军控制地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他们上交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上午，在区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会后

游行。

在同一个时候，广西“四·二二”两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抵制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开到市革委会门前阻挡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牌匾时，发生了冲突。

同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召集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告诉他们有关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事宜。

同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研究三个问题：①关于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②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广西“四·二二”的“邕江风雷”大毒草的问题。③公开揭露参加天津黑会的人的问题。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欢呼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二版刊登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同日 桂林市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斌（广州军区后勤部二〇分部部长），副主任郝忠云（一四一师师长）、陈秉德（市武装部政委）、刘竹溪（原桂林市委副书记）、季兴华（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冯邦瑞（原桂林市市长）、苏玉山（原桂林市副市长）。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上报中央关于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对的情况报告。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指出“农

总”的罪名是：①组织人员非常复杂，其中五类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坏分子六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四人，杀父之仇二人，投机倒把分子二人，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干分子极端仇视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攻击毛主席。③公开提出在农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纲领”。④诬蔑、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⑤该组织的头头企图逃越南。⑥敲榨勒索，强奸妇女。我们意见是用四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南宁市召开军民大会。

18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大会。

19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声称“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声明”。

同日 《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霍泛》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所谓批判霍泛的四篇文章。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新华社总社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十八日集会情况简报。简报说新华社广西分社未经革筹小组同意，私自发出了这个会议的稿件，新华社总社根据分社报道，将稿件摘入十八日的综合报道中说：南宁十八日有三万多军民在朝阳广场开会。据此，我们认为：一、十八日的集会是新“四·二二”指挥部单独举行的。他们拒不参加十七日革筹小组召开的军民大会，是分裂行为，我们不支持。二、新华社分社的报道失实。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开会，无解放军参加。该报道加剧了两派矛盾，建议新华社更正这一报道（后新华社总社未予更正）。

21日 桂林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鹤青（桂林军分区

政委)、副主任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吴新中、张束之(军分区副司令员)、康凝(二〇分部政委)、梁连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22日 广西“四·二二”三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四·二二’成立一周年”。会后游行示威,声称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反对大屠杀。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召开庆祝大会情况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促进革命三结合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南宁区体育馆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是毒草,要开展批判。“对毒草不批判,对坏人不抓,是右倾保守”,“对坏人要充分揭露,坚决打击”。还传达了康生关于谢王岗不能参加革委会的所谓指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梧州军分区党委和梧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斗》的电报。要求查清“造反大军”“连续放火烧房”的原因,是哪些组织放火的,查清“造反大军”内部哪些组织最坏,其头目是哪些人。同时严禁“联指”进攻“造反大军”据点,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彻底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三版整版刊登两篇文章。一篇署名“卫东思”的《痛击反革命逆流,保卫革命委员会——批判“邕江风雷”三

月二十九日的〈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一篇署名区民政厅宣传组的《垂死的挣扎，绝望的哀鸣——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24日《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社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文章，题目是：《撼山易，撼革命委员会难》、《绝不允许牛鬼蛇神翻天》，并转载《广西联指报》同一主题的“大批判”文章《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2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三十人的名单。

同日《广西日报》三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七篇文章。其中有南宁“工代会”写的《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断反革命的脊骨》，南宁“农代会”写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宣卫东”写的《把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批透批臭》等。

28日 广西“四·二二”中学红卫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史妙甫带领下，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抗议有关自治区革委会人选问题。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此事件向中央发出“四·二二”中学红卫兵冲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的情况报告。

同日《广西日报》一版头条报道《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领导阶级斗争——浦北县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人民主动向阶级敌人开展进攻》。三版在“坚决打倒霍泛”通栏标题下，刊登《痛斥霍泛“钱粮挂帅”的反动谬论》等五篇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来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流窜来邕的陈在森、陈龙生发

现后，便纠集“四·二二”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中的几个坏人，把林、祝二人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凶手陈在森、陈龙生被南宁警备司令部抓获后处决。自治区革筹就此事件发布了公告，并向中央作了报告。

30日 部队八个连和民兵奉命对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下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五月一日打下了“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八月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判劳改关押中死亡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拘留六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为“上石农总”是在广西“四·二二”刘锡荣的指挥下，而广西“四·二二”指挥部的组织机构，是以派性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从派性出发，加入该组织的。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批复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

5月

1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

采取的强硬措施等问题。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有关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柳州武斗情况简报》(并报广州军区)。

3日 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在总指挥部(“长征楼”，后改为友谊商店)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弹药。会上组成了九人抢夺领导小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由于对灵山、合浦、东兴(现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已十分惨重，于五月三日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同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广西“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去抢驻南宁区体育场的六九三六部队二营的武器。在“四·二二”去抢枪时，六九三六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抢枪。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四·二二”抢枪的信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四·二二”的汽车，抓捕“俘虏”。晚十一时许，当六九三六部队一营的军车从二营驻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时，被“联指”的“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武装扫射，打伤解放军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却广播说“四·二二”抢夺部队武器，拦截六九三六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

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题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的所谓社论说：“由中国赫鲁晓夫黑干将陆定一、周

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即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四版整版刊登“支左兵”写的《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揭露所谓“天津黑会”、“黑戏”。

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多次讲话精神，四月份以后，在区文化大院内开展了所谓“砸二黑”的运动（后又扩大到砸“三黑”即黑会、黑戏、黑画——刘宇一的“国际画廊”），《广西日报》五月四日社论发表后，砸“三黑”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延续到年底，波及到全区各地、市、县，造成严重后果。在广西，由于“黑会”、“黑戏”、“黑画”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进行审讯逼供、批判斗争、搜捕关押的受害者共一百七十多人。一九八三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开始后，所谓“二黑要案”才得到平反，受害者恢复名誉。

5日 晚十二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〇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了这一事件。

6日 广西“联指”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装备后，周总理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7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对“联指”五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8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五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

期交回。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

同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铁“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装备。共抢去各种枪支三百一十六支,子弹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发,六〇炮、迫击炮二门,四〇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四十七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12日 广西“联指”总部通过所属组织沥血红卫兵(简称“沥血兵”)搞所谓“禽兽展览”(即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原区地质局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林执真、张祖贵等十人受尽侮辱和折磨。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部和各“兵团”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总理“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坚决打倒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四篇文章,诬蔑傅雨田。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

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全区已有五个专区、两个市、七十五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使一些地区出现新的反复”。报告还说:“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表明,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南宁‘四·二二’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并报广州军区)。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

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

同日 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智理(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李均、孙长锁(军分区司令员)、华英、章瑞林、毛凤鸾。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

19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为了顺利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斗争盖子,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以及南宁市解放路银行办事处被“四·二二”广西“工总”接管问题的处理等问题。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全区各级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六十多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促使乱揪乱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

同日 上午九点多,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青年近卫

军”(简称“青近”)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开枪射击。“青近”进行还击,被“联指”打死两人。接着“青近”以为华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便攻占了粮店,并炸毁粮店三楼一间房,粮店一职工及妻女三人被炸死。“四·二二”人员攻占粮店后,见楼上并无“联指”武装人员,于当天下午六时撤离粮店。这就是轰动南宁的“五·二〇”事件。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对这一事件提出处理办法。

21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四·二二”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同日 拂晓,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等人,以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并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黄永胜给广西军区领导人来电,要求他们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

22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该县武斗严重的原因是:第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叛徒变节分子”、“右派分子”、“下台干部”和“走资派”等挑起来的;第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暗藏特务及社会上牛鬼蛇神混进群众组织,进行阶级报复;第三、“黑线”从外地伸

向凤山。南宁“工总”有人来，德保县“走资派”、东兰县“走资派”来过凤山“活动”。此外，还有香港特务也插手凤山。《调查报告》还说：“凤山是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是中南地区的一面旗帜，却遭到南霸天——陶铸和广西党内走资派贺、霍、傅之流的极端仇视”。“那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调查报告》要求对凤山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挑起武斗”要采取“强硬措施”。

25日 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

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同日 广西军区派部队围剿上石“农总”二十六天后，开始撤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

文革的报告说：根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即组织部队分批归建。各参战部队回原单位驻防，指挥所于二十九日返回南宁。由县人武部负责继续追捕外逃的三个坏头头。

29日 中央文革来电，同意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于今天赴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30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决定拔除距本派据点区展览馆仅一路之隔的广西“联指”区林业厅据点。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二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杀害“联指”成员十二人，开枪打伤一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及一批财物，炸坏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二人。这就是所谓的“五·三〇”事件。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同日 晚上，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进攻林业厅大楼枪杀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的公告》，把派性杀人的“五·三〇”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同年七月份解放军武装解决“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参与策划和袭击林业厅“联指”的主要有关人员共三十人，除五人后来在武斗中死亡外，其余二十五人均先后被关押。在派性的支配下，因受“五·三〇”事件株连的林业厅一批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杀害，有的受冤进了监狱，有的长期被批斗、摧残。

6月

1日 上午十时许,自治区监委、计委、南宁市二中“小八”红卫兵、广西大学“能闯”等造反组织的五十多人冲进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广西常委、国务院侨委副主任)家,把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长期与中共合作,当时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若真和三个孩子赶出家门后,抄走李家的大批文物、古画、瓷器及金银珠宝等贵重财物。不久,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组织批斗,游斗李任仁,将李任仁同四个“牛鬼蛇神”押到街头示众。李任仁遭到毒打,烈日曝晒,回家后神志不清(李任仁被赶出家门后,不能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同年八月十七日,邕江洪水泛滥,李任仁住地被洪水淹没,李因身边无亲人照顾被淹死在家里。李任仁冤案,至一九八六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给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中共中央关于全区五月下旬情况简报中说,桂林市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桂林“造反大军”于五月十七日攻打“联指”据点,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军队,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市革委会主任)、“彻底改组桂林市革委会”、“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挑动农民

进城,要揪出来示众”等口号。由于武斗严重,两派连续夺枪。在夺枪过程中,打伤解放军数十人。简报还说: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很严重。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情况报告说,我们于五月一日凌晨用八个连的兵力,对广西“四·二二”宁明县上石“农总”实行武装封锁包围,经一个月的工作,部队留下一个连外,其余七个连已撤回。

4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后备军”、“沥血”红卫兵、“小八”红卫兵及“红色林业”等十三个组织,约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〇炮八门,子弹一百多万发。事件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面对广西“联指”调动大批农民武装进城攻打“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问题的指示》。

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所谓声讨“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针对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再次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来《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

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同日 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用高射机枪攻打广西“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三楼起火燃烧，因火势不大，很快被驻守人员扑灭。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一《公告》发布后，被派性利用，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死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昨天公布了所谓《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后，今天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

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样就使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误抓和误杀了一批无辜者。

19日 广西“联指”常委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的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惨案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此案才得到处理，颜景堂被依法逮捕判刑，何唯钦等被开除党籍。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十九日“火种”据点被杀六十二人事件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

23日 《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十七日发布的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论《彻底摧毁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

大造舆论。

同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要求广西“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一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风”号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后，全区各地“联指”一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今天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三篇长文，“批判”所谓天津黑会、黑戏，“揭露”广西“四·二二”派人参加所谓天津黑会的“罪行”。

2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公布“上石农总”为反动组织的情况报告，宣称：经过对其进行了武装包围，逮捕了首恶分子若干名，整个组织已经解体。经反复调查后，我们认为“上石农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揭露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拟于适当时机在全区范围内公布“上石农总”是反动组织。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彻底批臭“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六篇文章，“揭露”、“批判”“四·二二”“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紧急声明。文章说这纯属

“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阴谋，一定要批深批透批臭。

7月

1日 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2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的动力，在部队民兵中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后“三忠于”（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在全区广泛开展，大搞毛泽东像章、建造毛泽东塑像，以致发展到人人跳忠字舞等，这样做，把毛泽东当作偶像神化，不仅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破坏了党与领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还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浪费。据反映，较贫困的大新县在“三忠于”运动中全县耗资就达一百多万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要求进驻部队要排除万难，深入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依靠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要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同日 在京的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对当前情况进行讨论研究后，给广西军区打电话，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①继续对贺、霍、傅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②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③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④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五、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

六、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对军区领导可以全文传达，对团、师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的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

4日 广西军区召集南宁市全体支左干部大会。军区负责人作“南宁当前形势”报告。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

5日 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问题的决定。

同日 晚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 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2. 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 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 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 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攻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在广西为派性所利用，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在全广西造成乱杀人，死人众多的极为

严重的后果。

6日《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这一报道，对全区各地发生的乱杀人的严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广西日报》三版在特大通栏标题《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下，刊登署名区卫东的文章：《彻底粉碎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同时配发评论《不准老右翻天》。

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举行千人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大会宣读《布告》并讲话，说《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区革委会早日成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对《七·三布告》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要条条落实，坚决紧跟，把矛头始终对准“阶级敌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角落里统统拉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说，接到布告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组织人员，深入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宣传《布告》。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入，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简报之二》宣称，一小撮“阶级敌人”仍继续蒙蔽群众，抵制和破坏《布告》的贯彻，新“四·二二”说，《布告》是“变色龙”搞出来的，是镇压“四·二二”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当时，所谓流窜人员，实际是各地“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避难人员，一些“联指”造反组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四·二二”一批人。

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三》说，“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来，已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高潮。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派出飞机散发《七·三布告》后，又布置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宣传《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于是，全区共翻印散发《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要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于上午联合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吹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和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强调《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要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坚决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向地、富、反、坏、右、“反共救国团”分子等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11日 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

欢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区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四》。说近几天来，对《七·三布告》的宣传，从城市到农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众组织揪出了一批坏人，其中有“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大会，“欢呼《七·三布告》”。广西军区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围歼“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布》。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在广西军区和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先后发表九篇社论。紧密配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部署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围剿，对全区又一次出现的惨无人道的乱杀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七·三布告》公布后全区乱杀人较《七·三布告》前严重得多，有些地方死人比《布告》前增加好几倍，给全区带来深重的灾难。

1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五》。宣称深入宣传《布告》后，原来跟新“四·二二”指挥部走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找“老指挥部”联系，表示拥护“老指挥部”。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广西“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后，“四·二二”在其控制区外边的朝阳路和邕江桥附近布防。警司发布这一恢复交通问题的通告，预示将以武力解决

为“四·二二”火力所封锁的朝阳路至邕江桥的交通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简报”未提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武斗情况，只是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四·二二”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十三日南宁市革委会和警司发出《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后，当天，大桥附近的“四·二二”据点连续向邕江大桥打枪，打伤过路群众二人。

14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行对“四·二二”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七》（内容大体同十三日）。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区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

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同日 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地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进行了包围。与此同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据点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部署总攻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等到广西军区汇报。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说十七点五十五分至十九点三十分，解放路的广西“四·二二”向军区机关开炮。军区院内中弹五发，打伤战士二人。

16日 《广西日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大会。一版在《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通栏标题下，突出报道十五日南宁十三万人集会“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二版刊登大会《向毛主席的表忠书》和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二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刊登记者采写的大会侧记长篇通讯，大造声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下午四时许，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作鬼！”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八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

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

17日 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赴京学习班的“誓师大会”上说，《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阶级敌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规模武斗，要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布告》的全面落实。

同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南宁市的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第二次炮击船只是上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广西“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〇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八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四百五十四吨，大米七百吨，杉木二百四十立方米，干辣椒五十吨，药品和药材一百六十五吨，薏米一百七十二吨，桐油一百三十二吨等等。被烧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

西“联指”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彻底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版和三版刊登署名“宣卫东”的所谓《彻底清算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真特务谢王岗的滔天罪行》专文。从此，谢王岗受冤被关押了十年时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平反，并恢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在南宁的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军区党委委员都到会。会议研究了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坏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提出：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明纵火原因，以免你说他，他说你，要最后作结论。

18日 按照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指示，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及“联指”又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全区城乡约有七百万人次参加了这样的大会。派性严重的人，利用此类大会，大造舆论，把不同观点的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镇压。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

措施的报告》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从十五日到十八日，先后将新“四·二二”控制的永宁街、和乐街的民房烧了大部分，停泊在民生等码头的驳船被烧三十只。解放路与新华街交界处几十家商店被烧，灭资路银行、妇女儿童百货商店、冰室、三合馆、朝阳百货大楼已被烧毁，上国街、自强路有几处民房也起火。这次纵火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七·三布告》的贯彻落实，据部队“观察哨”发现起火的原因，是有人从新“四·二二”据点出来点火和掷汽油瓶烧的。当时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十八日中午就打伤三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做法是：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布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二、积极做好两派的工作，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拆除路障，恢复交通，上交武器。三、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团等领导共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①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群众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②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③对邕江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

1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说，

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①组织了指挥所。②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③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三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河池专区革委会、凤山县支左领导小组发出通知。通知说：“凤山县原副县长×××，在‘文革’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指挥武斗，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不少坏事，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单位，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应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21日 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22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四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广西教育学院所谓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了“欢呼《七·三布告》，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后，今天又分片召开“坚决贯彻《七·一八批示》〈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号召“无

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行动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用特大号黑体字制作通栏标题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五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24日 中央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同日 柳州军分区曾于二十一日请示广州军区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即忻城、来宾、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县，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市郊区）“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四·二二”据点，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吃去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仅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

题后都分别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

25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继续进攻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街道，不断向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据点开枪炮击，多处起火燃烧。

同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个连二百多人进驻广西大学，进行所谓宣传、落实《七·三布告》和领导“斗、批、改”。在“斗、批、改”中，通过审查批斗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厅级干部二人，处级干部五人，科（县）级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讲师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干部十人，工人七人，学生三十一人，家属二人，校党委副书记高仕克于八月一日被当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斗后，押送南宁警司关押了七年。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三中全会后陆续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但不够彻底，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员作了适当的处理。

27日 广西“联指”攻打南宁百货大楼。据一九八三年自治区和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联合调查组调查证实，“联指”这次攻打百货大楼是用高射机枪、四〇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28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包围攻打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域——南宁市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投汽油瓶、打燃烧弹，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联指”和南宁市革委会，以及南宁警司当时广播说是“四·二二”的人纵火焚烧南伦等三条街道民房，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武

装掩护“群众”救火遭到炮击并死伤多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3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及南宁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接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联指”对广西“四·二二”施加压力，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其上交武器，反戈一击。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社论强调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围歼“阶级敌人”。

8月

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时结束。打死驻据

点人员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检讨错误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装’，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六人，伤五十二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二十三人，伤五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南宁“联指”武斗人员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昨天已被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打成了一片废墟。

3日 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还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鼓动各专、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要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4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围攻解放路，数发炮弹落在解放路银行办事处左右两侧的民房中着火。“四·二二”解放路中心片指挥所保卫处数人来到银行，用十字锄砸开铁门，并打开金库，找银行干部清点钞票，共现金五十一万零四百三十元六角。当时，“四·二二”头头熊一军也来到现场，他当面给银行干部打了收条，然后将钞票抬至解放路土产门市部后面球场焚烧。

5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抓获“俘虏”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周年》。社论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第三版报道各地工农兵欢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消息。呼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6日 从南宁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广西“联指”一大批人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

8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包括在押居民)。“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

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本月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

10日 部队和“联指”武装歼灭广西“四·二二”后，上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人武装游行。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人员攻打、炮击、爆破“四·二二”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加在广西“四·二二”一方。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下令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后，决定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在展览馆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今天开馆预展。并决定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前往参观。

同日 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

·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话说,根据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全县八十六个大队,有八十一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11日 下午,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器誓师大会”。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南宁警司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肯定和表扬广西“联指”参加“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上缴武器的“革命行动”。

12日 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五十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

级革命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等二十六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时间，尔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韦国清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伍晋南、安平生、韦世经（南宁航运局工人）、林福文（南宁橡胶厂工人）、毛凤鸾（凤山县农村女青年、“活学活用”标兵）、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干部）、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任副主任。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北京代表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头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十一日“联指”召开“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完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围攻解放路胜利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捕后，关押期间被动用十五种“刑罚”审讯，一批人被杀害）。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南宁警备区、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布置做好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区发出“关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18日 南宁举行军民大会。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

以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动员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九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广西日报》在其贯彻《七·三布告》的所谓宣传中，原计划发十篇社论，今天发表到第九篇。这篇社论说，广西贯彻《七·三布告》，消灭“阶级敌人”，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也很快就诞生了。因而社论发到第九篇结束。

同日 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送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20日 桂林发生了严重的“八·二〇”事件，对桂林“造反大军”及同其观点的干部、群众刮起所谓“十二级台风”，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〇”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有些人还不断升官晋级。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得到正确处理。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又一次炮击、焚烧停泊在邕江的船只。而《广西联指报》于八月二十七日却报道说：“八月二十日七时正，在邕江纵火焚烧两艘有汽油、柴油共二百四十四吨的船舶，这是‘四·二二’航运‘工总’一小撮坏头头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纵火焚烧援越抗美物

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滔天罪行”。

2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这次报告取消了上次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

同日 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述评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从而实现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区、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述评”把全区各地以所谓“捍卫”、“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行残酷派性镇压，乱杀无辜，造成数万人惨遭杀害的严重状况当作“伟大成绩”、“大好形势”，把派性路线当作所谓“正确路线”来大加宣扬。

23日 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24日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从北京回到南宁。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综合消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消息副题特别指出：经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极其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区四个市、八个专区和八十二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

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会。综合消息宣告了全区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在胜利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凯歌声中，各专区、市、县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前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一片红”。

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陈开路、徐其海、刘重桂、韩世福、伍晋南、赵茂勋、肖寒、韦世经、邓成汉、邓文光、林福文、陈启品、蒋运英、毛凤鸾、肖桂荣、农其新、曾春生、颜景堂、何作然、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员一百三十三人。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江燮元（广州军区副政委）、欧致富、安平生、韩世福等作了重要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套红通栏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二版发表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

29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粉碎他们翻案复辟的罪恶阴谋”。

9月

2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本报消息”：《一定要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报道自治区新闻战线集会，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他们在新闻界的爪牙钟林之流，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罪行”，全面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来党的新闻工作，诬蔑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和党的新闻工作。

4日 《广西日报》刊登陈永贵的文章《握紧锄把子，管好笔杆子——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流毒》。

同日 广西日报社、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举行批斗大会，将区直新闻单位已揪出来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黑笔杆子”七十多人进行批判和斗争。诬蔑这些人员在新闻单位把报纸和电台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所谓罪行。

5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社论诬蔑“我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许多部门，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庇护下，长期以来，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文人、黑教师爷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窃取了领导权”。社论强调，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

6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

(扩大)会议,连续批斗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参加批斗大会的有区革委会委员、广西军区、南宁驻军领导和三支两军人员,还有区直机关干部。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批准河池专区革委会、河池军分区组织四百八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凤山县,宣传动员“散匪”(即跑上山避难的“四·二二”人员)下山“投诚”。这是因为八月十二日部队和十二个县(厂)“联指”武装四千多人围剿凤山“四·二二”“七·二九”人员和无辜群众后,有一些群众带枪逃进深山老林。“宣传队”和县人武部、县革委会宣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强迫“散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投诚。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韦明景带枪逃上了高流山。韦明乐父亲上山动员。韦明景下山“投诚”。但韦明景回去第二天就被拉去杀害了(当时年仅十七岁)。从此,逃上高流山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尔后,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下令派兵围剿韦氏三兄弟长达十四年时间。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8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稿《共庆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整个运动已进入斗、批、改的新阶段》。还报道南宁十多万军民昨天集会,纵情歌唱全国山河“一片红”,广大军民决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广西日报》还综合发表全区军民《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我区军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消息。综合消息宣传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部署开展“斗、批、改”的精神和决心。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说，“破获了反动组织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农总上石分部设作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下属十七个分团，一个武装连，农总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经常活动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公布这个案件（冤假错案），对当时全区各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四·二二”带来重大的影响。

10日 下午，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集“三办”、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和区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攻打解放路后，“关于南宁市‘俘虏’、‘收容’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的汇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听完汇报后说：“对这批九千多个‘俘虏’，要根据不同情况，交由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作具体处理……”。九月六日，成立审查处理“俘虏”领导小组，组长由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兼任，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担任。

11日 《广西日报》头版整版篇幅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斗号令，同仇敌忾，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旺》。

12日 《广西日报》遵照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指示，今天编发一个版的批判谢王岗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文章。

15日 为突出宣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广西日报》又出八版。发表自治区负责人在(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刊登了(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等文件。配发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上述总结报告、《决议》、《决定》和社论,都强调组织阶级队伍,狠抓阶级斗争,掀起所谓斗、批、改的新高潮。在所谓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革委会成员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三忠于干部”。一些“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就是按这样的标准选拔进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窃据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权。

19日 广西军区收枪小组向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党委上报《关于贯彻〈七·三布告〉,动员群众组织上交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广西“联指”(指南宁“联指”)上交各种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占抢走数的百分之九十,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四发,军用手榴弹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缴广西“四·二二”(指南宁“四·二二”)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三件,占抢走数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各种弹药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发,军用手榴弹二百五十四枚。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要求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对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反应。因此,今天《广西日报》一版突出报道南宁专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大会传达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广西日报》还突出报道柳州铁路车辆段

革命工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消息。其标题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强调要主动把阶级斗争这件事管起来，不管一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能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各地传达贯彻区革委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和自治区革委主要负责人的总结报告，从自治区机关到基层组织，从工厂到农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所谓“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县，各大、中学校，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几个、几十个甚至百余个干部、教师、教授、工人，扣上“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反革命”、“反军干将”、“牛鬼蛇神”、“右派”等罪名关进“牛棚”和私设的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干部职工受到残酷批斗和惩罚性劳役。区直机关将批斗对象按罪名轻重分为三等，一等送南宁茅桥监禁审查；有的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二等送进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后改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审查。三等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上这批干部长期被关押、批斗。到一九七二年才陆续“解放”，有的关押到一九七九年。

同日 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惨遭迫害，在狱中逝世。刘振武反对林彪一伙的“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并推翻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刘振武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敢于坦率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却被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

件”，于同年八月十二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刘振武逮捕。刘振武在狱中病逝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宗颠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审定报民政部批准，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医院、科研等十六个单位大会”。会上，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代表区革委会向十六个“工宣队”授旗和赠送毛主席像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批“工宣队”以产业工人为主，有解放军参加，共二千四百多人，分别进驻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一中、广西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区人民广播电台、南宁市东方红医院、区水电厅等十六个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运动。此后，各地、市、县革委会也派出“工宣队”进驻当地的学校、新闻、科研等单位。由于“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贯彻执行了广西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继续以“左”倾错误思想和派性指导运动，颠倒敌我关系，把不同观点的分子和教职工当作“阶级敌人”进行乱批乱斗，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带来严重后果。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三篇狠抓“阶级斗争”的报道，一篇是隆安《光明公社革委会以中央〈七·三布告〉为强大武器，深入后进队炸开阶级斗争盖子》，一篇是《克服右倾松劲思想，深入开展“三查一清”工作——凌云县上伞公社对敌斗争取得新胜利》，一篇是《玉林军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使命》。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助长了全区乱批乱斗的歪风。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各地驻军、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这是有鉴于许多地区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通知》发出后，由于全区并未停止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派性没有受到遏止，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制止乱捕乱杀的有力措施，各地乱杀人的现象并未能制止。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通知前，还抢先口头通知说要赶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这些地方出现突击杀人，乱捕乱杀比《通知》发出以前更严重。

10月

4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为期五天半的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大会（所谓伍修集团，即伍晋南等发表“四·一九”声明后，一批支持伍晋南的观点的干部被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打成“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各地、市、县代表共一万多人。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等主持和指导批斗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李殷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会批斗和示众。有六十六名处以上干部被划为“伍修集团”成员，也被拉到大会陪斗。大会还勒令全区六十一名副厅以上干部交代与“伍修集团”的“黑关系”。在五天半的批斗大会上，伍晋南多次反驳说：广西没有“伍修集团”，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团”总头目，更不是总后台。

10日 自治区革委会作出干部下放的决定。把下放干部与“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紧密结合，实际上把一部分不

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和不赞成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的人作为“清理”、“下放”的对象，下放到农村、基层或“五·七”干校。有些年老体弱和久病的干部也照样被下放。

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两篇“典型”报道。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广西医学院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捅“马蜂窝”——广西师院炸开阶级斗争盖子，面貌改变》。这两篇“典型”报道都说“工宣队”进驻院校后，认真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所以院校面貌大改观。“典型”报道还号召所有的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狠斗“阶级敌人”。该报第三版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通栏标题下，刊登进驻广西日报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蔡宗立的文章《把报纸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文章诬蔑《广西日报》这个新闻阵地，一直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及报社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钟林之流所独霸，他们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窃取了《广西日报》的领导权。文章宣称要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报社的一统天下，挖掉报社“修正主义”根子，把报纸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12日《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谢王岗》通栏标题下，刊登四篇批判文章。一篇是该报记者报道《浦北县东风公社群众同仇敌忾，把谢王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永远不得翻身》。一篇是浦北县革委会办公室写的文章《谢王岗在浦北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一篇是区党委宣传部“革命领导小组”写的文章《戳穿谢王岗贫农出身和当过长工的两张画皮》，对谢王岗进行恶毒诬陷。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关于下放干部的报告，报告内容：一、开办学习班，深入斗批改；二、继续清队，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挖出来；三、对伍晋南，中央未表态，群众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革委会要做工作，统一政策，并不反对打倒伍晋南；四、大破大立，精简机构，合并机构。各单位逐级上报下放干部名单，留守人员组织编队，离开单位按连排编制过军队生活。区直机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战线、系统编成大队，进行斗、批、改和落实宽严政策。

从九月中旬以来，继自治区革委会组织批斗贺、霍、傅、谢、袁之后，南宁市革委会又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区、市建工系统、宣传系统、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等也分别拉贺、霍、谢、袁去游斗和批斗。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勇追穷寇》。社论说在贯彻《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后，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炸开了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内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对“敌”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社论继续鼓吹极左路线，煽动派性，扬言要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各单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该报还配合社论刊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东方红医院对敌斗争深入发展》的所谓“典型”报道。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

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从而使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上、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并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11月

3日 《广西日报》报道《南宁十五万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公报的发表》。

4日 在区体育馆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前，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决定要把“伍修集团”的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当作“活靶子”，拉到全区游斗，以掀起全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由自治区革委政工组负责组织游斗，并成立所谓批斗领导小组。从今天起，在“批斗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总领队、副总领队率队把贺希明等五人押送到全区八个专区、四个市和三十多个县进行骇人听闻的巡回大游斗。这一游斗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止，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共批斗了四十九场。参加批斗人数共达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所到之处，必召开

万人甚至十多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且把当地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头头”等拉去陪斗。全区被拉去陪斗的县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在游斗过程中，往往结合游街示众，有的甚至搞“活人展览”，并结合当地的“宽严大会”来进行。贺、霍、傅、谢、袁等五人及陪斗人员都被挂上黑牌，武装押送，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

为了配合游斗进行，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成立了“伍晋南集团”材料组，编写《伍修集团罪行录》，印发十七万份，各地又翻印三十万份，散发全区。原区监委还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编印了一本一百六十四页的所谓《广西牛鬼蛇神总后台伍晋南》的专册散发，恶毒诬陷伍晋南、贺希明等领导干部，流毒很广。

6日 自治区革委会按照斗批改的步伐提出整党建党工作，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把在“文革”中的杀人凶手、造反起家、对“文革”所谓有功之臣突击拉进党内。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七千多人。

18日 所谓“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闭馆。全国有二十五个省、区派人前来参观（区内有七十七个县、市，十六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进行活人展览，被展览者被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

和摧残。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12月

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军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南宁隆重开幕。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出席会议的所谓“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共三千五百多人，多数是在严重派性下推选出来的所谓“立场坚定”的“文革功臣”，有的是“三种人”和杀人凶手。

6日 自治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会举行所谓“三忠于”报告会。自治区革委会、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听取“讲用”。

7日 “积代会”分组讨论“三忠于”报告。《广西日报》军管小组遵照上级指示，报道讨论会。报道的主题是《大赞大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副题是《代表们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8~9日 全区“积代会”接连两天在区体育馆批斗“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质问伍晋南。区直机关

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伍修集团成员”的领导干部也被揪去会场陪斗和示众。每天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26日 历时十四天的所谓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闭幕。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

27日 《广西日报》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积代会”闭幕消息。标题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誓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并发表社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把我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热烈祝贺积代会胜利闭幕》。

1969年

1月

7日 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发出《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和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负责人，共一百八十二人。会议主要讨论全区一九六九年春工作安排。会议提出：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斗、批、改要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继续批斗“贺、霍、傅、谢、袁”。搞好整党建党，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第四、要求执行政策，区别矛盾，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自

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继续在全区范围内游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全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全区从区直机关至各专区、市、县、社、队，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遭到审查、批斗、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21日 荔浦县革委会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之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认定“反共救国团”为假案。

29日 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拘留审查。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

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扣发的工资，撤销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而且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良好的影响。

2月

3日 自治区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解放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误处理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对玉林专署专员熊福芝进行审查，并宣称“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福芝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东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所谓“六〇六”（审查地下党专案组）专案。“六〇六”专案组成立后，对地下党成员进行残酷迫害。自治区革委会分管政工工作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在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召开的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的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查”。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这位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到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来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的所谓“调查材料”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一名，叛徒五名。叛徒可疑分子七名。玉林地区革委会‘六〇六’专案组

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据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科级十七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

在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讲话指导下，全自治区掀起了一个残酷迫害地下党成员的狂潮。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专案人员共七百多人。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被迫害成精神错乱，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查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原桂北地工委书记吴腾芳、委员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被残酷迫害。又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专区“三办”派人到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〇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所谓“南路党”的问题。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作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案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信。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全县被审查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〇九人。自治区革委会当时还把广西革命老区东兰、巴马、凤山

作为审查的重点,使一批老红军、老平叛惨遭迫害。如东兰县有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所谓“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而受到残酷迫害。当年红军右江独立师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被诬为叛徒,并将东兰县革命烈士陵园内所刻的他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的光辉形象。

批斗、专案刑讯逼供,历时三年多,造成极端严重后果的广西地下党假案,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由于广西某些领导仍坚持“文革”期间广西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全面开展,才对此案进行彻底查证落实,广西区党委于一九八三年以桂发〔1983〕45号《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予以平反。事实证明当时自治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诬蔑,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

3月

3日至1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讲了话。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下降,教师队伍再一次受到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如玉林地区,全地区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办。五十八间中学,初中下放给大队、高中下放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地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的只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区内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报道。从此区内各专区、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当时广西把插队、下放和“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把城市所谓“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坏头头”与城市知青共二十多万人先后下放到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4月

1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20人。全自治区为“九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

14日晚,南宁市号称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

(即原来的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发后,改称“七·三”广场)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自治区革委会“三办”把区直各单位的审查对象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区直机关部分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集中到武鸣壮文学校,即所谓“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收场,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学习班”进行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干部有60多人。

“学习班”设主任、副主任,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〇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六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人员,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

这些案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在一九八三年处理

“文革”遗留问题时，绝大部分已得到平反。已平反的主要重大冤假错案有：

(一)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二)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伍修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三)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一九六八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平反决定。

(四)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平反决定。

(五)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

5 月

8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学习毛泽东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件。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社论。五月二十二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会议把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左”的一套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

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

7月

1日至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改革、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给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

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

3日 为纪念《七·三布告》颁发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的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8月

月初以后，根据毛泽东“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自治区革委会的部署，全区各专区、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

9月

11日至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

“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判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判“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新的教育制度。会议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会后，对全区中小学进一步进行“教育革命”，使我区教育事业在“左”的路线下进一步遭受摧残。

10月

十月份以后，全区精简下放工作开始酝酿，各级革委都开办了学习班，要求干部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服从组织分配。接着大批干部下放。年底，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六九年的形势和七〇年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精兵简政，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区、市、县也精简了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多干部下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事实上，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当时把干部划分为几种类型：一是所谓“根正苗红”，“文革”中“立功”的，进革委会班子或留在机关；其余的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部分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下放到基层，一部分到“五·七干校”，一部分去参加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被审查)”,从而使大批干部身心受到摧残。

12月

三十一日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与部分副主任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号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1970年

1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决定》(载《广西日报》，不另行文)。《决定》对一九七〇年的工作提出：1、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2、百倍警惕，加强战备；3、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工农业大跃进，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4、各级革委思想上、作风上要进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领导工作重点转向基层。

5日~17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各专区、市、县、柳铁、区直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共六百二十二。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〇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七〇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落实“九大”各项任务，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求：1、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要联系实际贯彻林彪“二十九字方针”，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

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开展“三反”，教育上批判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孔孟之道，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和“读书做官论”，落实“五·七”指示；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要求学好、演好、捍卫革命样板戏；3、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4、继续抓好三分之一，争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个战役结束；5、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

这次会议《纪要》提出：“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跃进不行，搞中跃进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跃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同时还认为要解放思想，争取我区工农业生产在最短时间内跃入全国最先进行列。要求今年粮食产量达一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六至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决心击退“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疯狂进攻，促进实现今年工农业的大跃进。

这一次会议比较全面地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教育战线上、文艺战线上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进一步推行了极左路线。

9日 天津下放来广西的医务人员二千多人到达我区，分配到七十个县，一百七十个公社和医疗单位(这些人员于一九七九年后，绝大部分已陆续回天津市)。

一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的指示，由河池军分区、巴马县人民武装部的主要负责人部署指挥，组织部队、干部和民兵一千多人，对巴马县那桃、羌圩两公社一些干部和农民为了躲避“刮十二级台风”而逃上山的所谓“土匪”实行围剿。这一围剿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结束，耗资四万余元，

上山人员中被打死十九人，捕获判刑四人，株连亲属四十九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彻底平反，受害人员及其遗属得到昭雪和安抚。

一月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在平果县黎明公社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推广黎明公社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二十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平果县革委会在黎明公社召开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这次会议助长了全自治区所谓“深挖阶级敌人”运动的发展，为即将开展的“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打下思想舆论基础。

2月

9日 自治区革委会接到毛泽东二月五日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4号、5号、6号文件（即《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自治区革委会当日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决定“要闻风而动”。当即成立六人的领导小组，下设“二·五”运动办公室，并于当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到专区、市、县，同时向区直全体干部传达，电话会议后，区直及各专区、市、县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在全区开展“二·五”运动。

10日～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二月十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发〔70〕14号）。《通知》列举并强调了我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所谓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

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帮助”手脚不干净的人“斗私批修”。《通知》还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要以这一斗争为中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至年底结束，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全区不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又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惨遭迫害致死、致残、致伤和受到各种清理处分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澄清了问题并妥善地处理。

在整个“二·五”运动期间，有不少人受到迫害，造成严重后果。如桂林市在“二·五”运动中，组织三万一千多人，在全市范围内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个所谓重点对象；桂林地区各城乡共动员组织了三十五万人，分三千三百多个战区，对四万一千多个所谓重点对象进行大清理。在革命根据地的东兰县，开展“二·五”运动中，进行所谓“九查九挖”（即一查本地阶级斗争史，挖叛徒；二查敌伪分布情况，挖敌伪党团骨干；三查伪人员，挖历史反革命分子；四查解放前后外来户的政治面貌，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五查五类分子的言行，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六查几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七查资本主义倾向，挖投机倒把分子；八查小孩作案，挖幕后指挥者；九查清仓核库，挖贪污盗窃分子）活动。共挖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二百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三百九十一人，挖出“地下工厂”十一个六十人，“地下商店”五个七人，“地下运输队”九个三十四人，“地下包工队”十五个七十六人，全县共被批斗三百七十五人，其中自杀十二人，还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华大皇国反革命集团”冤案。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首犯”李玉庭等三人死刑，立即执行，一人死缓，三人二十年

徒刑，一人十五年徒刑，五人十年徒刑，一人五年徒刑，戴帽管制三人。东兰县这一大冤案，一九八四年才得到全部平反。

3月

2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简称《三·二七通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

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三·二七通知》精神，四月开始在全自治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和

各地、市、县革委会，分别成立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对外称“三办”二组）。从此在广西开展了长达三年半左右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对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在我区发生的“文革”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案清查。致使“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及其同观点的大批干部和群众被专案审查，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不少人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和犯有“五·一六”罪行的人。一九八三年六月，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平反通知》，对错定人员进行了平反。

5月

1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韦国清、刘重桂、赵欣然、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赵茂勋等七人组成，由韦国清任组长，刘重桂任副组长。同日在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自治区革委常委（扩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落实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为中心内容。在长达三个月的学习班中，进行大摆、大揭、大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的种种罪行。在办班过程中，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几次听了情况汇报，作了指示，学习班结束时，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作了总结。总结中说：“回顾广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阶级敌人在那里搞，就是‘五·一六’在那里搞，就是那些叛徒、特务搞的，他们一开始就要打倒韦国清同志”。这次学习班的举办，确定了全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导思想、清查的范围和

斗争的策略。

20日 继四月二十八日我国政府发表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的声明后,毛泽东于今天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广西,各地连日举行集会、游行,欢呼和拥护毛泽东《五·二〇声明》的发表,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

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在广西贯彻执行后,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学同样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后果。

8月

八月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公安厅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会上明确把一九六七、六八年间,一派群众组织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反对砸“二黑”(即所谓文艺界的“黑会”、“黑戏”)等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和事来清查。

这次会议后，清查“五·一六”运动迅速在全区全面开展，由于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迫害的继续，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反革命集团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抛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广西日报》九月十日转发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要继续搞好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好整党建党。

9月

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发出《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中说：自一九六八年整党试点，一九六九年铺开整党以来，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单位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已有十二个县建立了新县委。在当时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在整、建党中，一些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被吸收进党内来，有的被“选”进了领导班子，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不纯。

九月上、中旬，《广西日报》在头版连续登载都安县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把都安县树为自

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1月

12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如何开好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基层党委及县党委的建立,在今年年底要有百分之七十的县级党委建立起来。

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按照中央的部署,广西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并提出进一步肃清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指出：“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一年的战斗任务，这是我们全年工作的纲领”。要求：以元旦社论为武器，用战备的观点分析形势，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确任务，制定措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将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领

导班子革命化,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5日《广西日报》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语录》的三个部分,即: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正确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自治区革委会以革政字〔1971〕1号文件发出《关于为〈广西日报〉选调新生力量的通知》。为“加强”《广西日报》工作,充实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在自治区、广西军区“双代会”期间,挑选了二十九名所谓“根正苗红”、“三忠于”、“四无限”的插青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十四人。

8日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今天结束。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南宁召开。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自治区革委常委、广西军区、自治区革委会各大组、各专区、市、柳铁、自治区“五·七”干校、区直一、二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上届自治区党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等出席了会议。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传达《康生在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代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是遵照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进行开门整风,为成立新党委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整风重点是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要批判所谓黑《修养》、黑《六论》,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肃清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等十二人,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名曰“自觉革命”。一月五日,自治

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作《关于酝酿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问题》的讲话。七日，经过三次酝酿后提出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一百二十六名。即：解放军三十四名、干部四十名、不脱产三十名、少数民族二十二名，其中妇女二十一名。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六点要求：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二、积极完成整党建党任务，继续抓好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开好各级党代会，建立新党委。三、继续搞好斗、批、改，抓紧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集中火力批判“刘修”贩卖的“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庸人哲学”、“爬行主义”；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阶级敌人要加强专政，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要继续深挖，对新冒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要露头即打；进一步抓好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部门的斗、批、改。四、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五、加强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六、努力提高干部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11日 当晚，南宁市军民集会。热烈庆祝毛泽东《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十三周年。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副主任等九人出席大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讲了话，说：“十三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分权力，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

主义’新闻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的‘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紧急行动起来，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革委会，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斗倒“难”字，打掉“怕”字，反掉“骄”字，破掉“满”字，大破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斗，力争尽快实现全区粮食亩产跨《纲要》。这是在农业生产上推行极左路线的动员会。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第三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即“反骄破满”运动）。学习济南军区的“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25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革委礼堂举行“热烈欢呼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红灯记》在我区隆重上映”开幕式。南宁市一千五百名工农兵群众和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红灯记》的上映，必将有力地推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运

动的蓬勃发展。

27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把路线教育当作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提出：路线教育必须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把它贯穿到一切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的实际，发动群众进行揭、斗、批、改。二十八日，第三版又发表《红旗》杂志《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思想评论。文中指出：“对斗、批、改怎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关系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

30日自治区革委会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指示，继一月十五日发出《举办第二期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之后，于是日举办了全区教育战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全区各地进驻中学的宣传队、管理中学的贫下中农代表、高中党支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高中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共四百多人。在学习班中错误地提出：“当前我区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在四十天的学习班中，一些教职员受到错误的批判。

同日《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医学院七一级工农兵一位学员题为《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的文章。文中荒谬地指责人体解剖教研室讲师汤冠军讲课中所说的“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是散布“活命哲学”。这篇严重违反医学科学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学院党委组织开展了对汤冠军讲师的批判，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2月

2日 《广西日报》以《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万岁》为题，报道了我区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宣扬党的“九大”以后，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所谓“吐故纳新”，清除了“废料”，吸收了“新鲜血液”，进一步“健全”了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一些长期坚持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一些坚持原则，敢于反对“文革”、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好党员，和一些在“文革”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真理的党员，在整党建党中被当作“废料”清除出党，而一批所谓在“文革”中积极策划武斗和乱打乱杀人“有功”的派头头，则当作“文革功臣”，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从而造成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4日 经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命乔晓光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5日 《广西日报》社论《狠抓路线教育，猛促春耕生产》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头春耕，放松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黑货”。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要经常批、反复批。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万事不离“纲”和“线”，田头、地脚都成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

9日至16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在南宁召开，历时八天。参加大会的有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党员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贯彻了“九大”错误路线。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工作报告。指出：广西曾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声称我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果。经过反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总结斗、批、改运动的所谓“伟大成果”时，他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还揪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纯洁了队伍。全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十三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有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一万一千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分子，吸收了六万多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在今后工作部署中他要求：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要继续抓紧、抓好。深挖阶级敌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委员七十八名、候补委员十六名。常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十一人。韦国清任第一书记，韦祖珍任书记，安平生任副书记。这次会议，把广西“文革”中执行的极左路线当作“正确路线”肯定下来，把在极左路

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当作“伟大成绩”肯定下来。这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安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功臣”和一些造反起家、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经过拨乱反正，把混进自治区党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清除出去。对造反起家曾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廖炜雄开除党籍。错误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日 《广西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声明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可靠的后方。十六日，南宁二十万军民冒雨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愤怒声讨美帝及其走狗入侵老挝的滔天罪行。

21日 南宁市的五所高等院校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大会。会上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红代会”提出号召：要发扬“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表示：“要用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广西农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要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其后果是教师难教，学员难学，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22日、23日 《广西日报》两天来报道了我区近二千多名“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七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些学员是废除考试制度后，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的。自此以后至一九七六年止，几年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专、百色医专等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多人。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不仅在

大学中,而且在中、小学中,造成教育秩序的紊乱,师生关系紧张,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

23日 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伯达,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自此,在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领导下,分期分批的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

25日 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负责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〇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等均有揭发材料,王、关、戚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钩子:一是直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二是王、关、戚指派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一九六七年这条黑线分成两个组(北京组、南宁组)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即“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最后,该负责人说:根据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条件已经成熟。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指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要搞彻底,我们已经查出不少线索,要开会交流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这次的所谓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3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我区从去年四月份在重点地区（主要是四个市）的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专案斗争，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活动的主要罪行，为发动群众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七〇年四月自治区革委会向各地、市发出关于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指定博白、上思、融安、东兰等县为重点县）。从现在起，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具体要求：一抓紧搞好专案调查；二开办学习班，培训骨干队伍（交任务，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传工作（大讲中央文件精神，大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策，大讲“五·一六”的罪行，大讲领导决心），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所谓清查“五·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通知》中宣布自治区党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通知》下达后，在三、四月份，全区各地层层相继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配备专案人员，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学习班；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对象。从此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迅速开展起来。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指出：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政工组负责人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会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负责人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又举办了一期规模大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

23日 《广西日报》转载北京大学署名闻军写的题为《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的文章，诬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

2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撤销自治区斗、批、改运动办公室，二是第二批党员干部会传达“批陈”的几个具体问题。

25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第二季度工作要点》。《要点》的中心是继续贯彻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要点》中提出五项任务：一、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自治区拟于三月底开办一期中央规定参加学习人员的学习班。二、建立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立新党委中，要抓好开门整风，突出抓好路线教育，调配好领导班子。三、继续认真搞好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条战线的斗、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住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要害问题“大破大立”。文化战线在继续批《刘三姐》、

《朝阳》、《英雄虎胆》等“毒草”的同时，以《苗家儿女》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艺黑线”。教育战线，在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的同时，要上挂下联，狠批“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四、抓好“四好”初评。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各级领导水平。

同日 《广西日报》在《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提高路线觉悟，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的文章。

4 月

2 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内部发行放映几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艺大批判的指示精神，《苗家儿女》影片从四月中旬起，实行内部发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点，放映后要组织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胆》、《刘三姐》两部影片，除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批判需要，经过专区、县革委会领导批准组织放映外，其它单位不再放映。

8 日至 21 日 自治区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和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错误地阐述和部署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所谓重大意义和清查工作的具体方法等问题。

同日 玉林地委“三办”在《关于钻进玉林地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

武、黄经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为假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关押，长期遭受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一冤案，于一九八一年予以平反。

1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区革委会保卫组关于全区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汇报说：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列举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数种表现，并建议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抓紧打击有破坏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区准备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听汇报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强调指出：清查“五·一六”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

1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区党委领导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的专案斗争。在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在全区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同时，结合开展“社会清队”工作。他强调指出：“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是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包括中央、区直和地直驻市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社会清队”主要在四市、各县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级的圩镇，清理的重点对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独立办道人员，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可以

通过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等，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十九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该负责人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各地层层进行传达贯彻，一个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全区迅猛开展起来。

19日 四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了各地、市和柳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以及路线教育试点的有关人员参加的“路线教育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广西军区等有关领导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认识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弄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反动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各地、市举办的领导、骨干学习班在“批修整风”中，要突出批修；报纸要组织好革命大批判的报道；文艺战线要深入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和“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毒草”。

25日 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高潮中，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在桂林召开了桂剧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旧桂剧是封建社会产物，解放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一直“霸占着舞台”。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桂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整套所谓经验。

5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政工系统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意见》。指出：自四月八日以来，政工系统在区文艺工作总团等五个单位，先后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最近，在政工系统骨干会议上，传达了区党委领导人四月十七日在地、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四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又相继召开了在八个开展运动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开各单位领导、骨干会议，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关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群众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陆续铺开。要求在清查过程中，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各地、市、县、部分厂矿、柳铁、国防工业系统、军工生产师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共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计划会议于是日结束。会议期间，学习了毛泽东最近发出的关于“批陈整风”、“反骄破满”、做好经济工作的指示，以及学习毛泽东批发的《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到会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总结交流经验，拟订了《一九七一年我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5日、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听取传达全国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批陈整风”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提出：自治区机

关在“批陈整风”学习中,对机构设置重叠的现象,要统一研究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层次、减人员。自治区革委会对全区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广播电台、柳铁等单位领导成员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六日,会议传达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召开并由康生挂帅领导的中央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在传达到领导班子问题时结合广西情况说:“全区三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干部中,工农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知识分子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老弱病残干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八,这部分干部不处理好,提拔、培养新干部受到影响”。“现在,全区在原有地、市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市长),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二十;在原厅局长干部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三十二”。

5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通知”,指出“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当天,《广西日报》配发题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论,指出:当前落实《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声称“要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余毒”。

7日 南宁市广大干部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和南宁市委、市革委会以及南宁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人在会上讲话。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对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

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的宏伟纲领”。他要求更深入、更扎实地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9日 自治区党委于二月中旬建立后,分别在三、四月份连续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的问题讲了话。会议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14日 《广西日报》从今天开始,以通栏标题开辟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专栏。“编者按”：“本报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从今天起,对反动影片《苗家儿女》进行公开批判”。指责《苗家儿女》贯穿着一条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号召广

大读者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向“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猛烈开火。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文艺革命大批判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以及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区和单位的写作小组成员，以《苗家儿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美丽的南方》等为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举办这一学习班之后，对影片《苗家儿女》进行了持续地批判。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又以通栏标题开辟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彻底批判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据五日至十八日在十六天的连续报道中，发表了五十五篇“批判”文章，大肆诬陷刘少奇等领导人。

21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举行隆重报告会，热烈庆祝毛泽东《五·二〇声明》发表一周年。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教育战线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全面教育”的伟大指示，继续深入持久地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以及“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这一“批判”，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24日《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了署名新文《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假，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护“一小撮”是真；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假，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是真；四、“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假，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真。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攻击。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会部分常委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摆“文革”中的“大事件”及两派参加大事件的情况。这次办班，实际上是为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现线索。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立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6月

1日《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编者按”：从今天开始，批判何直的“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指责何直的文章是打着反教条主义、探讨文艺创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写真实”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等。

3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新文《坚持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论，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文章。文中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搞阶级调和，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搞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专政”，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深入批判“人性论”，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

6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日，还批转了自治区公安保卫工作会议《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通知》。自治区党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狠抓公安保卫机关的革命化建设，加强对敌斗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工作。

12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上海机床厂党委会《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的文章。文中指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办好学校的根本，在大批判中建立新专业，设置新课程，编写新教材。宣扬“七·二一”大学是造就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经验”的推广，我区各地也办了不少“七·二一”大学。

19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彻底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的“林业党”反动谬论》一文，全版刊登了五篇“贫下中农”写的所谓《狠批“靠山致富”论》、《顶住了林业“包产到户”黑风》、《党的政策不容篡改》等革命大批判文章，颠倒是非，极力鼓吹极左思潮。

23日 自治区宣传、出版系统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

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他指出：“揪广西军区的二十个为什么”、“四管四训”、“冲击《广西日报》”、“冲击电台”、“一中兵训”、“六·一三武斗”、“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十五条”、“二·一九声明”、“四·一九声明”、“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属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要深挖。会后，区直文化系统开展大抓“五·一六”分子运动，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28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同意，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在自治区展览馆门前广场举行八百人参加的开幕式。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社论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29日 我区各地、市、县和柳铁，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新党委会。是日，《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文章。热烈祝贺我区地、市、县和柳铁全部建立新党委。在错误路线和派性指导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新建的各级党委会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有功之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7月

1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当天，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的通知》。

3日至1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关于上半年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纪要》。最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要求：一、县以上党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要结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势，对那些骄傲自满、讲假话、闹不团结和自由主义等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严重的单位，领导班子要进行开门整风。批判不正之风要上挂下联与批“黑四论”结合起来。二、要克服对敌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执行政策中形“左”实右的倾向。三、要大鼓干劲，狠抓工、农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四、要认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8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广西区党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坚

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大批判文章。

9日《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又集中地发表了五篇彻底批判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1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河池地区的巴马、凤山、东兰、南丹、河池、宜山、都安和罗城县检查工作，每到一处对有关形势，以及抓好基层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指示，并提出“住山、爱山、治山”的要求。到一九七三年，则把韦祖珍当时对工作中的指导意见，作为“污蔑”大好形势进行批判。以后又整理成“韦祖珍反党言行十八例”，组织进行批判。

1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武鸣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汇报武鸣“学习班”审查干部的情况。他说：在武鸣“学习班”审查的五百多名干部中，大部分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审查中多是采用群众“批斗”的办法，在问题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会上，还讨论了二十四名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其中，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有二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三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六人；政治思想错误的有十人；审查无问题解除嫌疑的有三人。这些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得不到正确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残。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定于八月五日召开，会议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区政治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深入进行思想

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各项政治思想工作在基层落实。

同日 《广西日报》举办的“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发表《推广大寨经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一文。长期以来,这一“讨论”进行了连续报道,鼓吹“学大寨”的极左思潮。

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广西和全国一样,广大知识分子在“两个估计”和“左”的政策下,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8月

5日至2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革委和区直单位、各级政工部门负责人、大专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事业分管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四百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搞好基层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为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社论。指出大庆是毛泽东提倡的一面红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在《广西日报》开辟《如何把大庆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

16日 自治区党委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和吸收新干部问题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自治区革委成立后，我们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对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初步统计约有七千名‘老弱病残’干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处理”。“关于吸收新干部的问题，全自治区一千零一十六个公社，按每个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计算，即应吸收三千零四十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条件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历史清楚，家庭和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一定组织能力，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在当时严重派性指导下，执行结果是把“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派性严重的人当作“优秀分子”吸收到干部队伍中来。有的窃据了各级的重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3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即：《关于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指出：我区各级领导班子是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干部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不脱产委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十五岁以下的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出席县以上“双代会”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关于全区路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

见》指出：今年以来，开展了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群众性路线教育运动，集中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增强了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批判“四旧”，增强了抵制腐蚀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关于全区文化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全区各地经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深挖了“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动的社会思潮，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同日 自治区党委还批转《关于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

9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举办干部读马列书学习班的通知》。决定于十月在南宁举办干部读马列书的学习班。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两本书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结合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等文章。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各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各地、市、县革委会宣传、政工小组的负责人，以及相当县以上厂矿、大专院校、自治区直属厅以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共五百一十五人。

12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

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地、市、县到会代表共三百一十多人。会议指出：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必须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个关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做好规划，制订措施，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鼓起更大革命干劲，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学习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21日至28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地、市、柳铁、区直四大组、武鸣“学习班”和自治区“五·七”干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产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清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个重点单位开展了‘四大’和专案斗争，办了七百七十四名重点人物学习班。”“根据揭露出来的‘五·一六’罪行”，初步排出十大事件：一、收集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几个组织；二、“二·一九”、“四·一九”夺权黑班子；三、揪“军内一小撮”；四、“北航黑会”；五、破坏区、市革委会成立；六、抢劫援越抗美物资；七、冲击桂林第三监狱；八、“九·六”抢劫桂林步校机密档案；九、南宁、梧州反革命纵火案；十、建立“反革命基地”。《纪要》要求：一、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二、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四、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五、认真抓好社会清队工作；六、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七、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斗争；八、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保

密工作。自治区党委于十一月二日批转了这一会议所形成的《纪要》。

2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增补乔晓光为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区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覃应机为自治区革委会生产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三个问题：一、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草稿）；二、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问题；三、举办马列学习班问题。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奋战三、五年，把我区所有县办成“大寨”式的县。

10月

11日至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所发出的57、65、67、68号文件。自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九月十二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以后，中央连续发出文件，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十一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的讲话。指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贯彻中央〔1971〕57、65号文件，当作当前第一件的大事来抓，并把这项工作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求：一、加强对传达贯彻中央 57、65 号等文件的领导。各级领导班子可分成两套人马，重点抓好中央文件的传达贯彻；二、用贯彻中央 57、65 号文件精神，来带动今冬明春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抓好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四、狠抓政治落实，包括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等。二十六日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中央 68 号文件问题。会议决定：为集中力量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县以上单位抽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去，先搞县级机关，然后再到基层，月底前做好传达文件准备工作，全区要求在十一月上半月传达结束。二十八日会议研究了贯彻中央 67 号文件。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在农村党员干部要分批、分片进行传达，贫下中农要分散传达，一个大队也可分片传达。县人武部、军分区同地方党委一起传达。要组织机关干部下去，每个专区都去人。区直四大组在南宁化工厂、邕宁县搞点。下去的干部归各地、市委统一领导。二十九日，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公社、柳铁党委、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党委、区直机关各大组、“五·七”干校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67 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是一场最深刻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是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总纲。要求全区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左右传达完毕。

29 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宣讲中央〔1971〕68 号文件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一、揭批罪行，大谈危害，激发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二、剥开画皮，认清本质，识

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三、大讲胜利，激励斗志，增强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四、提高认识，团结对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五、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搞好“两个结合”，争取更大胜利。

3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基层年终政治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总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以及做好生产队干部政治工作，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方面的经验。

同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区教革”《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文章，提出：鼓吹“天才论”就是反对学校向工农兵开门；鼓吹“理论至上”就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教育。

1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自治区党委向中央作的两个报告。一是关于自治区党委在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传达中央〔1971〕57号等文件的《情况报告》；二是关于龙智铭在五月间清查“五·一六”“罪行”时，卧路轨“畏罪”自杀身亡问题的《情况报告》。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讨论到龙自杀问题时说：去年办学习班时，龙智铭不交待问题，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群众揭发他大量“罪行”，又办了学习班，龙智铭感到问题严重，而“畏罪”自杀。我们的错误是对龙“管理不严”，龙智铭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他自杀应向中央汇报。

2日 自治区党委并以桂发〔1971〕111号文件转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出于“左”的错误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这一《会议纪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肯定。

7日、1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天来开会讨论自治区党委写作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为不断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两篇文章，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发稿。

19日至12月上旬 自治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革委会主管教育工作负责人、教育部门干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党委、革委会以及区直各部门、部分厂矿、宣传队、贫管会、学校和教师代表共六百多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对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部署。这一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长期以来成为我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把教育革命引上了邪路。

19日、22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路线教育以及今冬明春工作部署问题。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汇报说：林彪事件后，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公安队伍“新鲜血液”多，破案率低；在执行政策上，对敌人打击不力。听完汇报后区党委领导人说：要全面搞一个对敌斗争的意见。对敌人造谣破坏不打击不行，对敌人不专政不行，劳改犯嚣张，不杀几个不行，对资本主义泛滥要批判。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提示》初稿。

2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

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今后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问题。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一、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加强政策观念,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大力搞好基层建设,力争十二月以前做好生产队干部改选工作。四、认真做好实现明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工作,在农村着重批判“四旧”和资本主义倾向。

12月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通知〉》。指出“这一社论,全面、深刻而简明地总结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批修整风’运动极其丰富的经验”。强调学习社论要和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15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7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77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要求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

2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教育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育队伍,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

30日 《广西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

导》社论。指出：“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在深入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人在茁壮成长”。“目前，我区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占全区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国以来，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多次进攻，当前，这个阵地上资产阶级对青少年腐蚀、争夺和无产阶级反腐蚀、反争夺的斗争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着”。

31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路线教育总结活动。自治区党委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治区党委还派出宣传队分别到南宁化工厂、南宁市八中和邕宁良永大队蹲点，总结推广开展年终路线教育总结活动的经验。各地、市和柳铁党委都及时召开了各级党组织会议和举办骨干学习班，层层进行动员和布置。为加强对路线教育总结工作的领导，各地、市成立了“路线教育总结办公室”。

1972年

1月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中央[1971]77号文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斗争材料之一》)和8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学习和讨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区党委、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基本原则是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以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反动谬论。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区党委和区革委会的领导同志。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说,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三要三不要”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要求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热潮,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革命学风,把元旦社论精神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中去,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领导。

4日 《广西日报》发表通讯《柳钢在沸腾,柳钢在跃进》,把派头头刘目忠誉为“钢厂铁人”。刘因在“文革”中乱杀人,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而被判刑。

14日 《广西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题目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错误批判我区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写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15日 区党委领导人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检查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时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接着在全院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点名批判原院长张云莹和原院党委书记杨江等人。

18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贯彻中央[1972]3、4、5号文件,决定召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25日~2月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六十五人,候补委员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干部五百七十六人。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会议期间,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等三十人在大会上对林彪一伙进行了声讨、揭发和批判。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二人因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在一九八三年“处遗”后已开除

党籍)。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常委还和各地、市委负责人就会议结束回去后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一)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逐条逐段地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二)各级党委要把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抓紧抓好。(三)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五)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保密制度,认真做好保密工作。

2月

5日至中旬 各地、市、县委遵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1971]77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也都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批判发言。二月中旬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全区五万五千多名宣传队员,近百万骨干队伍,向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口诛笔伐,掀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高潮。

10日 根据一九七一年试点经验,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委和柳铁党委发出《关于在城市、县城的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社会清队”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广泛开展四大讲(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阶级斗争新

动向，讲社会清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第二步，开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四大”即：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八查”即：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要求通过“社会清队”把暗藏的阶级敌人、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清查出来，整顿基层组织，落实群众专政，组织居民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这个文件精神，各地、市、县委都陆续部署和铺开了“社会清队”工作，有的县则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一起搞。在清队中由于派性作怪，乱怀疑、乱揪斗，搞得广大群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梧州、柳州、北海、贺县、资源、阳朔、凤山、巴马、环江、都安、罗城、柳城、融水、横县、武鸣、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清队”中就揪斗了二万八千五百多人，定为伪军、警、政、宪、特和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在“清队”中，各市、县普遍搞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美其名曰：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结果到农村后，许多人的住房成了问题，许多人不习惯农业生产劳动，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在农村生活不下去，许多人又慢慢地倒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许迁回户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据桂林市、南宁市和钦州、南宁两地区不完全统计，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户”达一万六千八百多人。

12日 《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必须

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作者署名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24日、2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

3月

20日至4月11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到会人员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泽东批发的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学习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声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我区经济领域中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严重现象；许多工矿企业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队、工纠队、支农、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严重不足，影响生产和营业任务的完成。全区亏损企业达百分之三十，国营农场亏损也很普遍。会议认为很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24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传达这个谈话纪要，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打下思想基础。

29日至4月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讨论了江青在接见广州地区三省(区)部分负责人时的“指示”。会议期间区党委一位领导人对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自治区常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对过去在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也作了检查。四月六日，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代表自治区常委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对过去在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如下检查：(一)过去几年，因迷信林贼，对他盲目崇拜，经常对他进行吹捧、宣传，充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经常把林贼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吹捧林贼，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在传达“九大”时，说林贼“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紧最紧”。一九七〇年，自治区革委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把林贼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毛泽东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学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广西日报》配发的社论上还写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二)错误地翻印、编印林贼的反动言论和吹捧、宣传林贼的材料。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印发了编有林贼“语录”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十万册。广西日报社选林贼已公开发表和还未发表过的报告、讲话文章共三十五篇，编印林贼的“言论集”十万册。自治区编印的中小学课本中，也有吹捧、宣传林贼的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区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展览中，有一幅仿制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毛泽东与林彪会师，颠倒了历史，美化了林贼。有些单位还自行翻印关于“党内两条

路线斗争史”的小道资料。据初步清查，全区共发现五种版本，都有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内容。（三）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七〇年三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错误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四好运动”在全区的开展，使一些单位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助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全面落实。（四）为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的指示，自治区党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错误地引用林贼的话：“教一个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特别是在林贼叛国出逃后，又于九月十五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这个通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7日、8日两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会，就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位领导人在不明林贼真实用意和过份崇拜、迷信林贼的情况下，在华东大组会上的发言中也说了“要设国家主席”、“宪法中要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国家当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当然副主席”的错误言论，并对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满意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位领导人认识到上当受骗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检讨。由于该领导人在发言中对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满，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就触怒了江青一伙，在广州地区三省（区）负责人座

谈会上被江青几次点名批评。在四月七、八日两晚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常委们就以江青的批评为依据，无限上纲上线批判该领导人，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违心地作了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上了贼船”、“犯了反党、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线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同日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指出：过去吹捧宣传林贼的地、市委要作检查，自治区党委的检查要发下去。区党委某领导人的这次检讨要送中央；这次检讨连同他在北京的检讨要往下发，传达到县团级。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主要领导人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区各地进一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二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狠抓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和捣乱。有的书写吹捧林贼的反革命标语；有的呼喊为林陈死党招魂的反动口号；有的同港特勾结，递送情报；有的大肆造谣，煽动战争恐怖。三是各级党委要不断增强党内外外的革命大团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

本月中下旬，各地、市、县党委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1972]12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5月

4日 为彻底清查林陈(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情况,自治区党委成立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四办公室),区党委和区革委会分工二名领导负责抓此项工作。

17日 自治区党委将专案办公室(即“四办”)综合整理的《林彪死党江腾蛟一伙拉拢、控制广空桂林船修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向中央专案组报告。

6月

13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我区九所高等院校开展秋季招生的通知。强调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认真选送优秀的工农兵上大学,要认真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由于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入学的学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也给一些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7月

4日~8月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

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推动我区批林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中的党员，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县、市人武部的负责人，区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区直机关、南宁地、市和南宁驻军的县团（包括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听了传达报告。

区党委和区革委的主要领导人等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到会人员用十三天时间，着重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部分中央文件，阅读和讨论了中央[1972]24、25号文件。接着用十天时间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〇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文章《论短促突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讲话等反面教材。接着用四天时间进行整风。

· 30日 上午，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关于过去在工作中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下午，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大会上检查了自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31日 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在南宁市大组会议上检查过去几年中，对林贼盲目崇拜，经常吹捧，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如大搞“三忠于”活动；把林贼的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对他的黑指示从不怀疑，并广为宣传；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小道找来的一份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如获至宝，未经请示，就编入《学习资料》翻印了三万余册，广为散

发,吹捧林贼,流毒甚广。

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和“三支两军”的负责人还学习了中央[1972]28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军队干部检查了“三支两军”人员中有的人因成了地方某个单位的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占用地方房屋,贪大求洋,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8月

4日 区党委领导人、革委会副主任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继续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融安县最近破获一个所谓‘中华人民救国军林彪野战部队’反革命集团。就策划过抢粮、抢钱、抢枪,上山‘打游击’,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还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重点仍然是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同时要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6日 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全区

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用半个月左右时间，以市、县为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车间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培训骨干。九月份陆续在群众中传达贯彻。

本月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区各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组织宣传队伍。九月下旬开始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群众传达，到十月底，十一月初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风中，各地根据“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指示，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不少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事实证明，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被公判的，有一批是以派划线造成的错案、假案。

12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听取自治区党委专案组办公室汇报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情况，并向中央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有林彪死党江腾蛟等十六人到过广西，有八人被他们拉上了贼船，接受交底，陷得较深的共有七人；沾边的有八人”。（据中央专案组最后审查结果表明广西没有林彪死党成员）

9月

16日、2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次开会，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乱打死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以来，

广西各地在“文革”中不少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遗属上访上诉频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诉,迫切要求给死者正确定性平反和惩处杀人凶手。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处理,并要求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会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弄不好会反复,这是一件大事,处理了一个就联系到一派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区党委领导人又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人家不告状,就不要把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类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处理了”。会上定了四条办法:一、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搞派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二、要把乱打死人这笔帐记在刘少奇、林彪、王、关、戚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三、对死者家属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坚持一视同仁,政治上不歧视,工作(生产)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难的,均用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四、通过各项政治活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乱打死人的问题。

对处理打死人的问题,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关于六七、六八年期间我区发生乱打死人的问题,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看了这个文件。这是告诉你们,领导上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四条办法,让领导同志心中有数……,你心中有数,有四条办法可以做好工作,进行个别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大张旗鼓,现在不是时候,就是以后,也是个别找上门来个别解释处理,要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挑起派性”。由于当时的自治区党委领导对“文革”中乱打死人的问题没有认真处

理,因而会议以后,有些市、县在落实政策中,只是把一些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改为“非正常死亡”了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派性问题,惩办直接杀人凶手和乱杀人的组织者、指挥者。甚至“文革”中造反起家、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罪分子有的还入了党,升了官,继续搞派性,推行所谓“广西文革中的那条正确路线”。因此,受害者遗属不服,多年来,仍频繁地到上级党委机关和党中央申诉,迫切要求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惩办乱杀人的犯罪分子。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央对广西工作报告批示指出:中央希望你们进一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自治区全体党员同志和有关群众的认识,大力发扬党性,坚决克服派性,坚定不移地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抓紧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尽快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对情况复杂的“老大难”问题,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做好工作。接着,中央对广西自治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着重指出:几年来广西自治区党委和广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广西自治区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落实政策的步子比较慢,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处理,广大群众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因此中央派出了工作组到广西自治区进行处理文革遗留工作。调整后的区党委在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全区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才得到妥善的解决。

10月

25日 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将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纪要,即《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草稿),印发给各地、市、县及柳铁党委和革委,要求组织一定力量,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个公社或若干大队作为试点,贯彻实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试点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结束。《纪要》(草稿)共有十四条,对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提出了意见。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随后,各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开展试点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纪要》通知,全面开展贯彻实施《纪要》的工作。

11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 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会领导以及其他常委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十二月二日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桂林市委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一九七〇年四月,在

“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清查中，曹×（桂林市委副书记）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进行搜查。开始，市委部分常委决定清查三千户，这个面已经过宽了，而曹×又自作主张，提出“翻一番”。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了“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了八千多户。有六百多名干部出去搜查别人，自己的家又被别人搜查。这就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一九七〇年五月，桂林市医药站搞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案，是一个假案、错案，轻率地把五人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审查中又搞逼供信，严重违犯了党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三)一九七〇年，桂林市办第三期公检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对公检法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二是搞刑讯逼供，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共斗争了七十多人，后又把这些干部当作工人下放到工厂；三是让判处死缓、后来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舒××到学习班去作所谓学毛著讲用报告，还号召学习班的人向他学习，走他的路。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是严重的立场错误。当时在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对公检法作了错误的评价，有其影响，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不要过于追究个人责任”。

但是，这次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桂林市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

27日 自治区党委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我区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指示，我区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马列的书“多”、“远”、“洋”和反动的“三十字”方针，进一步认识“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改变了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三）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改进了领导作风。（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坚持政治与实践的统一，更好地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12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28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到会人员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摆了一些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如有的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有偏宽偏严现象；有的以劝退为名，随便开除职工；有的对扣发的工资该补发的没有补发，抄家抄走的财物该退回的没有退回，反映较多的是户口问题，许多下放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农村来的职工家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黑户”等。

1973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献词》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

10~21日 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会上各单位就一年来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及新闻报道工作情况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七三年全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继续进行以“三项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的“路线教育”。“认真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4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批复南宁、桂林市革委会关于撤销

“工人纠察队”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该两市的“工人纠察队”。

5月

25~31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总结交流“深入批修整风”、“与工农相结合”及“加强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二名。并经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自治区党委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十八人。梁吉泉、颜景堂任书记，刘美荣、唐以豪、莫家裕、梁梅芬、周卫红、卢黄基任副书记。这次“选举”把一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功臣”和派性思想严重的人以及犯有杀人罪行的梁吉泉、颜景堂选上担任团区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于一九八四、八五年对有严重问题的人分别作了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了刑事责任。

是月，全区各地、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纷纷传达和动员本地干部群众“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老红军干部的所谓“罪行”。当时的自治区党委给他确定了“直接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攻击诬蔑广西革命的大好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干部群众”等罪名。致使该同志遭受迫害，蒙冤近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至一九八三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6月

20~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期间,三十二名代表介绍经验或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决议”认为:“我区工人阶级在‘文革’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使教育事业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三人。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总工会常委十七名。岑国荣为主任(原柳钢工人,“文革”中造反起家,一九八五年被开除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副主任李家海(原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文革”中指挥攻打区水电设计院“火种”武斗前线指挥)、邓文光(原区建一公司工人,“文革”造反派头头,因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等八人。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当时存在严重的派性,使一些“文革”中有严重问题以及犯杀人罪行的人窃据了自治区总工会的领导要职。

7月

8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32号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号文件关于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的指示精神,结合

我区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从七月份起,全区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部分留在地方工作外,其余陆续撤回部队。七月九日,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全区各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管制小组等机构亦陆续撤销。

16~21日 自治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各族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和《全区各族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决议。三十四名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九十七名。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妇联常委十八名,主任为曾小平,副主任八人。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选派带队干部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经验,区革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选派国家干部带队的办法。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和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经常与知识青年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思想工作,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干部来源,可从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选派,原则上一百名左右知识青年配备一名干部”。

8月

14~29日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讲了话,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好形势,严格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对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形势大好”。全区已有二十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已有大批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两条路线斗争”,“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等。

18~29日 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南宁召开。都安、横县、钦州县飞跃大队、田阳县那塘大队等一百二十二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认为,广西“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并提出今后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二百零六亿斤和二百一十六亿斤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草拟了《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若干问题》的纪要文件。文件说,我区“农业学大寨的群

众运动正在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决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24~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广西代表有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岑国荣、盘美英、郭耀卿等二十二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韦国清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郭耀卿。

是月，广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

9月

6~17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了三届六次

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会上传达了“十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又举办“学习班”，组织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并逐渐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的热潮。

28日《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报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学大寨六年巨变的事迹》。报道说：几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精神，在乱石窝上“修造梯地十六万亩。全县粮食产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过了《纲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达到了一人一猪和两人一羊。五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二千多万斤，猪、羊二十一万头，成为少数民族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事实上，以上数字均严重夸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县委曾给河池地委、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虚报粮食产量问题的检查报告》。据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该县一九七一年虚报粮食产量四百六十八万斤，一九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一九七三年仅上半年就虚报了六千零七十五万斤，并制订了当年计划卖双超粮五千万斤的远远超过实际承受能力的浮夸指标，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九七二年完成征购数的六倍。县委为完成这一征购指标，竟层层分配数字，强迫农民卖过头粮，搞得农民苦不堪言。

10月

11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是月，自治区党委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厅、局的三十七名负责人带领，赴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分社队和厂矿，广泛宣传“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掀起一个“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十大’文件的高潮”。

12月

3~4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行报告会，邀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批孔”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柳州铁路局和各地、市的负责人，自治区、南宁市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战士等共两万人。自治区党委大部分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杨荣国的“批孔”报告大谈“儒法斗争史”，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批孔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杨荣国的报告，迎合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学、推行“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需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杨报告后作了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批

孔斗争”。后来，杨的报告录音在全区各地层层播放，并被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在全区掀起了一阵“批孔”的狂潮。

22日《广西日报》报道了全区一九七三年又有三万九千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

1974年

1月

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插手部队，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29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的负责人和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的领导人，以及地、市、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在学习班里，统一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农村有、城镇有。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广泛

发动群众，既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同时又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来。学习班至二月六日结束。学习班结束后，全区立即组织四万多名干部作为宣传队，由各级主要领导带领，到城市、农村基层，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随后，各地、市、县相继成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在全区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学员是来自“文革”以来从基层单位选进区、地、市、柳铁的党委、革委会的工农干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区党委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要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关系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必须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6日 为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深入，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看大字报并参加班组“批林批孔”会议，并与各车间党支部书记、群众座谈。座谈会上分析了全区运动发展形势，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这段时间，江青等人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应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3月

14日 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广西艺术学院工农兵学员、区直文艺团体的创作人员、演员以及梧州市粤剧团、南宁市曲艺队代表举行批判会，以“极大义愤”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到会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决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的回潮”，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但当时在广西也有人反对批判《三上桃峰》的。她就是柳州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四十一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看到评晋剧《三上桃峰》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柳州市委即以其“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为刘少奇翻案”，属“现行反革命”，判处她十五年徒刑。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给孙芷新平反。

4月

1日 《广西日报》发表《认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社论。社论提出了要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抓好典型的问题。

13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体育馆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市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自治区、南宁市以及各条战线、郊区、街道的六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会议。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军区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交流会由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主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16日 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自治区“五·七”干校，干校设在区党校原址（后迁往西乡塘），从四月中旬开始轮训区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是日，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正式开学，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一百五十名干部中，有局以上领导干部十四名，处级干部二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八十。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

乡。五月下旬，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给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韦祖珍到广西工作后，曾到全区五个地区、两个市、三十七个县和区直一些单位作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评。在批林批孔中，自治区党委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当作是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后现象（即突出问题十八例等），作为“诬蔑广西大好形势”来批判。这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而且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下来，给后来山区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查明这是一个冤案，自治区党委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作出《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问题的结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批，为韦祖珍平反，并恢复名誉。

24日《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狠批为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三〇二案件〉》。该文联系所谓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认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广西某些地方个别文艺团体移植演出的《三〇二案件》（又名《不静的海滨》）是“一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毒草戏”。“编者按”指出，“毒草戏《三〇二案件》的要害是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肆鼓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出现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明显表现”。声称“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三〇二案

件》之类的大毒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抵制坏书、坏歌、坏戏”。

5月

19日 《广西日报》配合全区批判韦祖珍的“罪行”,发表署名文章《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

28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总工会召开自治区驻学校“工宣队”代表会议,会议至六月二日结束。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四人出席了会议。区党委领导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研究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工宣队”的作用,狠抓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等问题。会议明确了“工宣队”的基本任务,即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

6月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文章《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11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开幕式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领导十九人,大会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总结交

流知青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经验。会议于十七日结束。大会通过了给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的倡议书,号召知青走毛泽东指引的革命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月

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作用;要抓紧“理论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工作;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为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各单位要组织落实。实际上要层层加强“两杆子”之一的“革命大批判”的“笔杆子”队伍。

5日至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区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并对理论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对于那些传播很广的《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反动”谚语、格言等贩卖孔孟之道的“毒草”,要进行批判。在会议的部署下,全区深入持续地批判所谓“封建”的“坏书”代替和取消了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

31日 自治区“五·七”干校第二期举行结业典礼。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要坚定地走“五·七”道路,坚定地办好“五·七”干校;当前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

8月

是月，自治区文化局党组在区直文化系统发动全体职工深揭韦祖珍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区文化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许圣亭（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乃健（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滨（支左干部、区文化局副局长）反对样板戏的问题。其中，《江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引人注目。后来有人在《十骂样板戏》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向自治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揭发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

这封信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写了批语说：“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样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国。”

自治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有计划地对许、张、江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许圣亭、张乃健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滨由区文化局负责审查。经过了在各种会上的多次批判斗争，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为江滨作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结论。事实上，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人所进行的批判是错误的，

它在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治区党委才发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

9月

1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军民十万人批判大会，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号召广大工农兵在批判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一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区党委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10月

21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党委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工会、妇联、共青团、公安部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广西驻军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学习上海建设“第二武装”的经验，明

确在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方向 and 任务；同时要组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积极宣传上海经验，大力支持民兵指挥部，把我区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时十天的会议于三十日结束。

11月

5日 《广西日报》发表了题为《以上海为榜样，加强民兵建设》的社论，指出上海经验的基本内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和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民兵队伍；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明确提出民兵的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加强民兵骨干的建设；建立民兵指挥部，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因此，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柳铁、广西军区政治部和区直机关有关单位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会议传达贯彻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分析全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揭发我区文化部门有的人疯狂攻击革命样板戏，研究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问题。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27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分析全区政治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的问题。出席

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一百一十四人。自治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区党委某领导人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全区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会议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要继续把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批判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战争”，彻底肃清《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女儿经》等坏书的流毒；要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迎接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12月

5日至13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柳铁党委，部分区直厂矿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以及自治区各战线、广西军区政治部、区直各单位和大专院校负责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共三百一十六人。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廖炜雄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把广西组织工作几年来推行“左”的路线，并在严重的派性干扰下，对“文革”中造反杀人的当作“文革功臣”和有严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并当作“成绩”肯定了下來。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确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

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西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处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国家干部,开除犯有严重错误党员的党籍,从组织上拨乱反正,否定了所谓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

18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宁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三千多人,此外,还邀请老干部、老红军、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工业战线和农林场站的工人代表,各个战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农代表、农村教师、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领导等十一人出席了开幕式。在广西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也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人分别致开幕词,安平生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报告。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南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抵南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向陈永贵汇报了广西工作。

24日 陈永贵在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中心会场在广西体育馆,另设三十多个分会场,共十八万多人集会听了报告。市区工厂、郊区、学校以及全区的生产队都普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盛况”空前,郭风莲通过大会向广西各族人民赠送了大寨大队的玉米种之后,郭风莲、赵二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永贵等的讲话,极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市有,机关也有,要把这股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要解决障碍大干快上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

干。昔阳县是通过抓点,解决了点面结合的问题,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这样就能干一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声势和气魄来。区党委领导人最后讲话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把我区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把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阳县。

26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代会闭幕。大会期间共有四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和个人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区贫协第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倡议书》,号召全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夺取明年新丰收,为实现我区第五个农业规划而斗争。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为一九七五年全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资批修总体战”那套极“左”的东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29日 在区党委领导人的陪同下,陈永贵等抵柳州市。陈永贵在柳州活动后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并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

1975年

1月

5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8~1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3~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大会通过了宪法,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至十一月,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实际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开始了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使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转机。在这段期间,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先后召开了有关会议,针对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懒、散的状况,开始一个一个部门、一个一个企业的整顿。这些整顿在我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太深,又有严重派性的干扰,使这些整顿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下去,自治区党委在下

半年作出决定，在全区开展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使“左”的东西再一次得到系统地发展，以致后来出现抢先批邓等一系列的错误做法，在全区造成极坏影响。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会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随后，各地、市委和柳铁党委成员都根据自治区党委通知精神，先后开了党委常委会或举办学习班，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在全区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3月

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和南宁市各单位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理论学习小组共二万多人。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各级党组织做好调查研究，联系实际，订出计划，做出具体部署，领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三月中旬，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把基层单位的“斗批改”抓一遍，自治区党委决定组成宣传队抓好“三分之一”。全

区从区直机关和各地、市、县、公社抽调五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开展所谓“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师生参加宣传队。不少干部、群众在“教育”中被整。

26~30日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工、青、妇的各级干部、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迅速行动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批修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4月

1~8日 全区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大会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自治区领导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把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三分之一”，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1日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颠倒是非、颠倒敌我关系，无限上纲，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23~29日 自治区党委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农村、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等十六个单位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这次会议，为即将开展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大造舆论。

5月

7日 广西日报社负责人传达自治区领导人的指示：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问题要处理。此后，《广西日报》紧密配合自治区党委开展的“批资批修总体战”，连续发表大批判文章，极力鼓吹极左理论，流毒深广。

24日 《广西日报》在报道自治区党委和地、市、县委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消息的同时，配发题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的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

下旬至6月，自治区党委组织各地、市、县委、部分公社党委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分四批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在昔阳与广西代表团会见。参观团先后在昔阳参观了二十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自治区党委强调要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大寨、学习大寨。参观团回到南宁后，自治区党委立即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求各地要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昔阳、大寨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实践；并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昔阳、大寨的紧急动员会。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致使许多农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蒙受迫害，造成了一

批冤假错案。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仅南宁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共处理了干部、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开除党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他处理六十六人。

6月

15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即《十条》），部署全区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简称“批资批修总体战”），进行开门整风。解决班子中“软、懒、散”和“五种人”问题。《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七，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自留地主要种社员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的要坚决地限期回来；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苓、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允许向私人购买。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

寨评功记分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七月份起，一律改为每个星期天为一圩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劳动力进行常年施工。《决定》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一个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区迅猛展开，大批干部、群众被当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保护伞”等进行批斗，蒙受迫害，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全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错整了一批好人。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仅据一九七六年一至六月统计，全区在“总体战”中揭发各种案件达二万五千五百多起，其中涉及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四百九十九人。除少数确有实据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外，不少好人被错整了。其次，运动中由于反复批判“工分挂帅”，强调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取消定额管理。这种“大概工”的推行，“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在思想上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再次，运动中，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的花样百出。诸如自留地“搬家”、“上山”，“禁止赶圩”，“不准私人养母猪、母鸭”等等。有的县还提出批判“口粮六百斤，着重抓现金”和“窑顶冒烟，收入二、三千”，从而限制了社员的正当

家庭副业，扼杀了社队的多种经营，窒息了农贸市场，堵塞了城乡商品流通。这使我区本来就很不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更加萎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7月

10日~8月24日 《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员文章，即：《评“野马”副业》、《“野马”是害马》、《锄“野草”》、《靠什么“上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钱迷》、《从一百户调查中得到的启示》、《事关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马”变“家马”》。把我区刚刚兴起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当作“野马”批判而被迫下马。

21日 在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示下，全自治区几年来积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共办了“七·二一”大学三十所，正在筹办的近一百所，至十一月底止，共办一百三十六所，学员五千多人。另外，中小学校办工厂（车间）一千六百三十一一个，以及农林场等。

8月

14日 毛泽东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

等中央领导人。这段期间《广西日报》连续发表《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等十二个专版的评《水浒》的文章。

10月

是月，全国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广西有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一百三十七人参加。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于十月底，从区直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抽调三千二百多名干部和师生组成宣传队，与地、市、县宣传队一起，到八个地区、四个市和部分县、社、队和厂矿企业继续抓“三分之一”，要求继续贯彻学理论、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

5日 中共中央决定调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安平生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1月

上旬，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五十多万干部参加了会议。大

家决心象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全力以赴，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由于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在农业生产上“左”的东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上旬，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随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在这运动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态度坚决，行动积极，抢先批邓。

12月

27日 经中央同意，任乔晓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1976年

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毛主席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精神实质,在新的一年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3日 《广西日报》一版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道了浦北县教育革命的成果。副题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广西日报》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该县各学校都要认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9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震惊人心的消息。可是在当天的第三版却在“以阶级

斗争为纲，夺取新的胜利”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小通讯《欢腾的乐里河畔》——记田林县乐里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干部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情景；还登了四幅表现我区工农兵欢呼、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欢乐场面的宣传画，画旁题有诗句：“新春喜读光辉词，迈步征途志更坚”；“夺胜利信心百倍，战逆流豪情满怀”。这与读者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心情是极不协调的，干部、群众反响很大。

12日《广西日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八周年，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17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口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廖炜雄在大会讲话中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因为区党委宣传部派驻《红旗》杂志社的人，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早已从北京给廖炜雄来信，传达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炜雄等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说什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的巨幅标语，贴在报社编辑部大楼的外墙上，这是南宁第一张公开写“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过路的群众十分惊异，停步围观。

18日《广西日报》刊登自治区革委会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在大好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组织群众过好革命化的春节，该报并为此配发了《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社论。社论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

大事。春节前后，往往是阶级敌人利用‘四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机，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一切挑战”。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通栏标题下，连续登了《过春节不忘阶级斗争》等文章。

下旬至二月上旬，《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了我区教育界、科技界开展“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把主张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条件错误地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为了配合“批邓”，刊登了广西区党委写作组署名“桂志”的题为《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编译局编印《关于“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部分材料》，摘编了广西写作组署名“桂志”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几处行文。），流毒全国。

2月

上旬，我区各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学校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部署，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到的“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的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一些严格执行学校纪律、认真抓教学质量的老师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斗、批判过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二月九日，《广西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南宁市二中党支部的文章

《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几天后，又报道了浦北县党委为深入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骨干的消息，之后又登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写的文章《不许篡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十四日收看报纸后，于当天下午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批邓”问题，接着又召开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地、市委书记和区直各部委负责同志等共六十七人参加），会上点名“批判‘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十七日凌晨，自治区党委以《对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同志开展初步批判的情况报告》为题，给毛泽东、党中央拍了特急电报。电文罗织了邓小平的所谓“罪状”并建议和要求中央考虑，在适当时机在全党全国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错误，彻底肃清其流毒。其后，又在县以上党员干部中对邓小平进行点名批判。

17日《广西日报》一版转载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常委立即进行学习。文中提到，“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常委们一看便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因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梁吉泉（在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被开除党籍）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传了回来。于是自治区党委立即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共六十七人）批邓，分工几个常委带头批。

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后，区直机关、各大专院校，各地、市、县党委也跟着照样办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级党委常委逐个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即毛泽

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并就在群众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了部署。报纸每天也都是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从而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11日至18日 自治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期间，代表们大赞大颂“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切身的体验，批驳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决心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

3月

31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广西自治区写作组写的题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4月

5日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四月初，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被中央错误地定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员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这就是被“四人帮”称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这个强大的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7日晚,自治区党委常委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并以自治区党委名义,于当晚十一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两项决议。

同日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广西日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光辉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启事》要求征文歌颂“文革”,继续“批邓”。

9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的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我们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日,各地、市、县的各族人民也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共三十七万人参加。《广西日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号召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

平”，“坚持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月上旬，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在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邓”。会议认为贫协的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21日 《人民日报》为了鼓动“批邓”，刊登了广西写作组写的题为《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国。

5月

3日至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有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南宁地区的部分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座谈会，对正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新高潮，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重点，是所谓总理遗言。要集中力量，定出计划，抓紧时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出结果。在基层单位还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南宁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区党委领导

人、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动员起来，打一场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这里说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指群众中怀念周恩来总理，痛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舆论。在这次追查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同日 在“学朝农，狠批‘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广西农学院筹备迁校。借用广州军区“五·七”干校在全州县绍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四百多师生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车站，再乘车前往全州。说什么这是“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由于无校舍，只好把农学院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五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四个公社和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口号是：“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因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们意见很多。打倒“四人帮”后，农学院搬回南宁。这样往返搬迁，劳民伤财。

上旬至六月上旬，自治区党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接见了参观团负责人，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东西，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参观人员回来后，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开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大搞人造小平原等等，极大地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破坏我区的农村经济。

14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了“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区党委部分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会上，廖炜雄致开幕词。梧州市光学仪器厂代表介绍该厂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坚决抵制、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经验”。

16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这一天,其他各地、市、县也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

1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电话通知》。《通知》说,这篇重要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这篇重要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在全区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唱、教唱。组织专业或业余作者编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区学校、机关、工矿、农村、部队掀起群众性歌咏活动高潮。为配合这一活动,《广西日报》于五月三十一日刊登《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七首歌曲。许多市、县的广播站协同文化部门举办了广播教唱节目,教唱上述歌曲。

31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批修批修总体战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把全区圩期统一由五天改为七天一次(统一规定星期天为圩日);禁止粮食、糖、

油、黄红麻、烤烟、木材以及中猪上市；建立健全生产队代购代销店；取缔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来，全区农村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总额增加，集市农副产品出售总值下降，成交额显著减少”。各地自实行上述办法后，许多县城和圩镇出现了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买不到柴草，造成城镇居民职工生活上很大困难，纷纷向领导反映意见，而一些领导竟说：“宁吃社会主义的盐巴，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市场冷落萧条，造成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

本月份，《广西日报》刊登“批邓”文章达到了高潮，几乎天天都有“批邓”文章，有的甚至一个整版和两个整版都是“批邓”文章，二十一日发表了《“猫论”就是复辟论》，二十四日二版发表了署名“区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翻案复辟》，同日的第四版还发表了署名“黄河”的长诗《第十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攻击邓小平。用诗歌形式如此毒恶攻击邓小平，在全国实属罕见。

6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一斗争中，我区各地紧密联系实际，揭露了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县革委

会的局长、副局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有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大量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还说：“去年，尽管有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干扰，但我们始终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县委书记以上主要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批资批修总体战，这实际上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今后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紧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使我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会上，还印发了一些“走资派”的典型案例。

7 月

28 日 《广西团讯》第十三期发表署名团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七、八月份，批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所谓“三株大毒草”，直至十月打倒“四人帮”后才结束。从一月到十月，《广西日报》刊登我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时一天四个版都是批判文章。

9月

9日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自治区党委于九月十日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唁电，“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也给江青发唁电，“向江青表示亲切的慰问”。

18日 全区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分别在南宁和其他各市、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各地人民群众表示，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0月

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拍手称快。

下旬，全区各市、县党、政、军、民、学，上千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城乡一片欢腾。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党中央、华国锋发了致敬电。

一九七六年，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

(一)《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四十三万五千册。(二)《评三项指示为纲》，印了五十万册。(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万册。(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十万册。(五)《简评〈水浒〉》印了二万三千册。(六)《〈论总纲〉选批》印了十万册。(七)《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印一万六千册。以上七本书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册。竭力宣传极左理论，诬陷邓小平，流毒广西以至全国。

附：

刘振武同志被迫害事件

刘振武，男，一九二六年生，博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革命，次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工作队长、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八年任博白文地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被博白县公检法军管会以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为罪名逮捕，同年九月二十日在县看守所监狱中含冤病逝。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作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九月二十六日，县革委会同意军管会上述的判决，造成严重的政治冤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九月，刘振武从桂平县搞“四清”回到文地中学。这时，学校张贴出他的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推行“封资修黑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遭到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刘振武家乡派来干部，请他回去帮助反映解决亭子林场所有权问题。亭子林场原是一九五六年在他倡议下由亭子一个高级社办的林场，由于经营管理好、发展快，曾得到林业部和中南局的表彰，一九六〇年，刮“共产风”，把林场划给凤山区所有。亭子乡干部、群众很有意见，要求把林场退回亭子乡，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他应邀回到亭子乡后，同一些干部、群众谈了自己对林场的看法，写了十七篇文

稿,反复强调:“要认识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绝对不能滥伐乱砍集体所有制的森林竹木,亭子林场的一切劳动成果荣誉是亭子人民的”,“禁止任何人进场进山砍伐山林,对一切破坏林场的现行犯,必须立即捕送公安机关惩办”。他在亭子逗留的时间不到二十天,便被勒令回学校了,回校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过问亭子林场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月间,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亭子林场受到严重破坏。

刘振武被指控是“破坏林场的罪魁祸首”,遭到残酷迫害。十一月底,他因病到博白县城求医,刚进城,博白两派持续105天的武斗开始了,因形势紧张,他不能回校,只好住进“造反大军”据点“城小”。但是在“城小”,他并没有参加武斗。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武斗对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博白两派实现大联合后不久,他离开了“城小”返回学校,到校后,仍继续遭到迫害,随时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带上炒米,重上八将山。

八将山是刘振武解放前打过游击的地方,他上山后,钻山洞,蹲山头,吃炒米,饮泉水,过着“白毛女”式的非人生活。在八将山三十多天的日日夜夜,他担忧国家大事,思考着“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写道:“炮声响处人心愁,誓要挖出水源头;救国何需问职位,愿我终生变作牛。”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由于环境恶劣,胃病恶化,刘振武无法在山上再呆下去,他的弟媳把他转移到那卜区大洞乡六岁村亲戚廖泰寿家里。

刘振武在廖泰寿家得到精心护理,病情稍有好转。这时,他便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将经过长时间

深思熟虑的想法写成二万多字的文章：一篇是《宣言》，一篇是《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刘振武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无私无畏的、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文章中以大量事实和鲜明的观点，充分揭露了林彪一伙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行。呼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林彪一伙作斗争。粉碎他们的阴谋、挽救党、挽救社会主义的祖国。他在《宣言》中首先指出：我们的党“近两三年来，受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我们的国家处于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他一针见血地揭露林彪一伙“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分裂出去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组成的‘派’”。“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全部的篡夺了她的职权。并且利用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骑在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这个‘派’性中央……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敬爱的领袖身边”。“推行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

论的”，“端出‘四个伟大’、‘万寿无疆’理论的人，无非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上‘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座上去。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其用心何其毒也。”“这个‘派’性中央，……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的反动哲学”；“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内战和大分裂。”“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刘振武在《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中指出：“‘两派都是错误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处的两件工具”、“两派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为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两派都执行了派性路线，……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同时指出：两派都受了蒙蔽，“对待受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进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刘振武提出：“现在摆在全党、全

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行使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赋予她的神圣的职权。并全力以赴地保证其实现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伟大的党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有七亿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远大的前途。”

刘振武写好上述两篇文章后，又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名义给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论，找到共同语言。”他的信和文章于七月二十七日由廖泰寿到那卜区大洞圩寄出。八月一日，玉林军分区领导人收到后，认为是一起“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交由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查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根据信的投寄地点，认为作案人可能在博白县那卜区大洞一带。县公检法军管会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侦破。据笔迹鉴定，认为“匿名信”是文地中学刘振武写的，并查知他早已离校出走。于是县公检法军管会侦破工作组开到大洞。同原派到亭子林场的工作组互相配合，全力破案。刘振武原住在六罗村廖泰寿家。后追捕刘振武的风声紧，廖将刘转移到附近一个庙里。后又转移到廖绍桂家，有时到山

上去过夜，后来收藏在村里的烤烟房。一天，工作组抓到了一个名叫刘振云的人进行审讯（此人有破坏森林的行为）。工作组对他说：“如果你能找到刘振武的下落，可以从宽处理。”刘振云为逃脱处理，接受了工作组布置的任务，查清了刘振武收藏的地方，并向县公检法军管会工作组汇报。八月十一日，一百多名解放军战士、民兵、公安人员把廖绍桂的村庄团团围住，山头上架着机枪。这时，被病魔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虚弱的刘振武被迫从烤烟楼上下来，带上手铐，出到大洞供销社接受第一次审讯。在审讯中，刘振武直言不讳地承认给玉林军分区写信的问题。刘振武关押在县看守所监狱里近四十天，先后接受了九次审讯。在审讯中，他始终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列举事实，从国际和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八大”党章确定的原则；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后果；说明他写文章的动机和指导思想。他在供词中说：“一九五九年处理彭德怀，我认为不妥当。……‘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打倒了，我认为不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妥，不如拿这些钱来搞生产。一系列问题我考虑很久，因此写了这么多东西”。“对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我感到突然……斯大林的缺点被人扩大利用来反斯大林。我考虑毛主席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我对毛主席的领导发生了怀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处于发生、发展阶段。在中国发展某些资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受陶铸的影响较深。陶铸说：‘农民不怕资本主义，就怕水肿病’。我认为有道理。中国如果复辟，就是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完成，就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写文章。”“除了这两篇文章外，我还准

备写三篇文章。一篇是《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这篇的中心意思是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不应提‘打倒’。……另一篇文章准备写关于工农业生产问题。我主要考虑是想恢复奖励制度，要搞物质刺激。农业方面我主张恢复大队一级经济，坚决按照按劳分配，取消一切按人口分配的有关规定。第三篇准备写第九届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主要是认为‘八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五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执行。……可惜三篇文章还没有写，我就被捕了。”刘振武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隐瞒，使审讯员感到惊讶。

刘振武在狱中，胃溃疡病急剧恶化，两次输血均未好转。在县公检法军管会组织的“活人展览”会上，他不能站立，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架住“示众”。

九月二十日，这位远见卓识、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含冤病死在狱中。

刘振武逝世后，九月二十三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作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九月二十六日县革委会同意县军管会上述的判决，造成严重的政治冤案。

刘振武参加革命二十年，一贯学习勤奋，工作热情，斗争坚决，办事认真，得到群众的好评。“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原则，坚持党性立场，和全国各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敢于同林彪“四人帮”展开斗争，揭露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行为。人们对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优良品德十分敬佩！对他遭受迫害，含冤离世，深感痛惜！他逝世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十分怀念他。一九八三年秋，全面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后，县委“处遗”办公室组织干部调查和查阅了

有关案卷，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写出《关于刘振武同志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刘振武生前的表现，中共博白县委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作出《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上报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刘振武十五年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

附：

寄玉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收

中 保 委 付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

到共同的语言。

由于这两个文件,对解决两派争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你们在刊印的时候,务请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检查校对,不要有任何只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以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会议还在继续举行,将要通过的有“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等三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以及会议的新闻公报等。这些文件,都需你们协助刊印散发,通过以后,将陆续寄给你们,请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

在新闻公报上,我们将公开我们的组织,及其主要的组成成员,以便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此致

革命敬礼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1968. 7. 21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一号文件

宣 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

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为挽救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免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一〉

我们需要保的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接着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需要保的党，就是 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

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的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二〉

我们所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为少数的几个人所组成的“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地篡夺了她的职权，并且利用八届中央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骑在八届中央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

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问过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破费国家的无可计数的巨大财富，巧立各种名堂，从社会上搜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蒙蔽和欺骗他们去支持他们自己。凡是上了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派别路线和派别政策的人，就一律被封赏为所谓“造反”派；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政策的人，都一律被贬为什么“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内战和大分裂。

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枪支、弹药以及“打倒”、“推翻”、“消灭”、“砸烂公检法”等等完全是对敌才能使用的武器，散发给上了他们的大当，受了他们蒙蔽的人。这样，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所谓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挥等等，恰恰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一个“派”性中央，已经完全毒化了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

〈三〉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损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张国焘式的“任人唯亲”的派别路线。提出这条路线的人，从根本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的灵魂，偷换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这条反马列主义的所谓“革命路线”，传给上了他们的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并且要这个派身体力行。而被贬为“保守”派的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需要，也从“派”性中央手里，夺过这

条所谓“革命路线”，从而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两派的对立。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形势十分尖锐。由此，即产生了遍及整个祖国国土的流血内战，“派”性中央号召人们忠于这样的“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号召人们忠于流血，忠于死亡，忠于内战，忠于祖国和无产阶级的最后分裂。“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

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人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呢？怎么会去推翻民主集中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呢？可见，实行一系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愚民愚兵政策，奴化政策，窃国政策的“派”性中央，其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四〉

这个“派”性中央，以长篇大论，咒骂“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是这个“派”性中央，公开号召砸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政法部门。并且公开说，“公检法一垮台，我就高兴”。同志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话，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究竟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个特别的性格，这就是昨天还称这个同志是“亲密的战友”，今天则突然宣布这个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昨天经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今天则突然下令撤职，一脚踢开。对这种神昏颠倒的行为，我们一言以蔽之，曰：反反复无常，法无定见。

这个“派”性中央，还有一个性格，就是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叫喊“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

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也是他；大喊“支持左派”的是他，下令“不支派”的也是他。对这种特殊性格，我们又一言以蔽之，曰：朝令夕改，早话晚忘。

这个“派”性中央，大喊立新功的是他，天天卖旧货的也是他；带头在党的八届中央搞分裂的是他，大喊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也是他；从根本上拒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他，大教别人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他。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行，我们称之为：言行不一，文过饰非。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睛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实行着派别路线，贯彻着派性政策；本来就专门靠撒播仇恨种子为职业，那么，怎么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解决遍及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从而实现真正的两派革命的大联合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目无党纪国法的，破坏党纲党章，破坏国家宪法的，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派”，那么，怎么能够有效地克服遍及全国各地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呢？怎么会能够领导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法无定见的人；本来就是朝令夕改，早话晚忘的人；本来就是言行不一，文过饰非的人；本来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把一切失败归于别人”的，实行私党、私国政策的最自私、最自利的人，那么，依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在七亿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呢？怎么能统一七亿人民的意志，并且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已经打击了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并且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保守”派，那么，依靠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能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并且通过他们去团结全国人民，以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卖旧货、论前功过日子，并且早已被“伟大前功”的沉重包袱，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会有半点力量，领导七亿中国人民，去开辟新的前途，创造新的业绩，树立新的功勋呢？

请问：在一个“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帮、黑线；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土匪绿林；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五〉

受了“派”性中央的圣人论的蒙蔽和欺骗的青年人，出于对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无知，出于对党中央的爱戴和拥护的善良愿望，听说要保卫党中央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这种精神，本来是可嘉的。但是，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保了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并且错误地保了这个“派”篡党、篡国、篡军的“贼赃”。同志们，应该想一想，难道八届中央的绝对多数的成员，会起来反对党中央，从而自己反对自己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青年人，显然你们已经上了大当啦！

这个“派”性中央，自吹开辟了什么“革命航道”，号召青年人要跟着游上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一条所谓“革命航道”，早已被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一层又一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叛徒、土匪……等等，严严实实地、密密麻麻地、结结当当地把这条所谓“革命航道”堵死了。你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游得过去，爬得过去，跟得上去了。人家在这条“革命航道”上游了几十年，跟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落得是一个“反革命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难道你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才迟迟跟上，会运气好一些，而能够捞到半点油水么？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先生又说，“路本来是没有的。人行多了

便成了路”。上了大当的青年人，还是回过头来吧！自己走自己的路，可能会稳当些，安心地多读些书，可能会得益多些。

我们诚恳地劝告那些盲目地跟在“派”性中央身边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那些人，在一系列严酷的事实面前，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黑帮、黑线、黑后台”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提防“背后一刀”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怕同那些以前功饰后过的，完全脱离了群众的人一起，终归被人民群众所唾弃，而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近十年来，我们从这个“派”性中央手里，除了得到破坏、贫困、仇恨、分裂、内战之外，别的东西，则一样也没有得到。从党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出发，从七亿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地清算这个“派”性中央的严重错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严重时刻了。否则，我们大家都将成为对党、对无产阶级、对祖国不忠的历史罪人。

当前，帮助党的八届中央，克服“派”性中央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八届中央的全体成员。在党的、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七亿人民的共同利益面前，重新实现大团结；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把被人们“打倒”了，“推翻”了，“砸烂”了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扶起来，并坚决地支持她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六〉

我们郑重地向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严正宣告：

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产阶级和七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的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国家和军队当成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成某一个人复辟封建主义的御用工具；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成某一个人的私人事业，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绝对通不过的，是完全枉费心机的，是绝对徒劳的。

二、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在党纲党章的制约之下活动。如果，有人破坏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这就叫做反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立即对这种反党案件，进行检查。并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中共中央监委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遵

守国家宪法。如果，有人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领导人，这就叫做篡国政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立即对这种篡国政变案件进行检察，并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能够顺利地行使党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顺利地行使全国人民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于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

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以自己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于祖国人民的模范行动，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果敢、坚定地去纠正任何伟大人物的错误。正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纠正领导的错误一样。现在，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只能证明他没有半点的政治远见。

六、我们真诚地、赤胆忠肝地、衷心希望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以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为重，从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感到你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太远了。我们感到你们在张国焘的旧路上走得太远了。

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几十年来，对缔造我们伟大的党、缔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成果，都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对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革命前辈著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总是当做最珍贵的财富，来备加爱护的。我们正是从保卫这些同志的光荣的、伟大的革命历史出发，才去批评同志的错误的。我们希望通过批评错误的事，去教育犯了错误的人，从而使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显然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充分意识到，帮助自己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自己对党、对同志尽忠的表现。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认识，能够改正，则是我们全党的幸运；全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的最大的光荣。因此，我们衷心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放弃一切个人的恩怨成见，认真珍重一切改正

错误的良好时机。

七、“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处的两件工具，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错误理论服务的。因此，参加两个派别组织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上了大当的。所以，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必须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认真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保障一切受蒙蔽、受欺骗而上了大当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教职员、革命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革命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切实帮助受蒙蔽、受欺骗的同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鼓励他们反戈一击，起义归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群众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团结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又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措施。因此，绝对不能有任何对受蒙蔽、受欺骗的人，实行打击报复，伤害人身安全的错误事件发生。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顺利度过由于“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暂时困难。并率领他们团结一致地、参加到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的队伍中来。

同志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

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通过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二号文件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现在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互相仇恨的情绪，还很严重。有的地方，流血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对这种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城乡工农业生产，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流血大内战，我们全党、全军、七亿中国人民，都感到无比的关切。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我们认为，站在无产阶级的即党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争取整个祖国国土，重新实现真正的和平，是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最严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我们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性质又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们又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保守”派是有错误的。但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地加以保护的。

<一>

为什么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呢？

一、两派都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帮助了“派”性中央，篡夺了党的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鸣锣开道，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一个完全正确的领导核心——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二、两派的斗争大方向都是错误的。两派都错误地把“派”性中央，根据他们分裂党的八届中央的需要所制定的，“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的派性路线，当作是什么“革命路线”来贯彻实行。结果，两派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革命者，都要把同自己对立的一派打成“反革命”。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如果，我们把“派”中央比做一块大石头的話，两派都是被压在这块石头底下的两条大黄瓜。不过一条被压在上面，一条被压在底下。在上面的一条，既感到石压瓜，又感到下面的瓜顶瓜，其所受的压力就特别重。在下面的一条瓜，没有直接感到石头的压力，仅仅感到瓜的压力，因而，反抗也就特别强烈。正是因为这样，就出现了瓜压瓜，瓜顶瓜的矛盾和争端。这就是两派争端的性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如果不揭开“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不把“派”性中央这块大石头搬开，那就势必两派都将被压扁在这块大石头的底下，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一简单的道理，可惜，至今两派都还不知道。

三、两派都使用了民兵枪支，都破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只不过是有多多少少的不同而已。两派都没有坚决地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置于一切派别的利益之上。两派都没有把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当做我

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来看待。

此外，当然还有别的错误，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为什么说，“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呢？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决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一套，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检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门；帮助“派”性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并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义之实。所有这一切，怎么能算不错呢？不仅是错，而且就其性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日，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

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兵、役民的奴化政策的欺骗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所有受蒙蔽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年青人还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对待受了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受了蒙蔽、上了大当的时候,他们是会痛苦的。在我们的百般热情的鼓舞和帮助下,相信他们是会觉悟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反面来帮助“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认真珍重无产阶级队伍的重新团结的话,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欢迎受了蒙蔽的同志,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是完全必要的。

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在大批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撤职、被推翻;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倒在内战战场的血泊里;青年学生应该分配工作的,分配不出去,应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国家破坏,内战不息,人民困难等等严重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会发现受损失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受损失的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铁案如山的事

实面前,相信他们是会把总的根源检查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有可能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过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

〈三〉

至于被“派”性中央贬为“保守”派的,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加以保护的?

因为,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我们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重要的领导力量。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干部队伍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几十年或十几年来,对国家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自己的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为克服三年的经济困难,都尽到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公安政法部门,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治安,都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们富于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过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我们党的、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保护他们,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难设想,目前的“造反”派,能够有力量担负得起他们的繁重的任务,能够取代得了他们的地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难想见,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开了他们,是能够设想的吗?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地毁灭整个国家的话,那末,正确地对待他们,则是完全必要的。

不能否认,“保守”派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错误还是十分

严重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同人民解放军的错误，“造反”派的错误一样，都是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所一手造成的。因此，片面地责怪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

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为挟持领袖，举行复辟政变制造舆论的需要，无限度地破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量的国家财富，去接待自己的客人。所有这些，所谓“保守”派的同志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的。他们对这种情况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他们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原谅的。

当“派”性中央为了支持自己的需要，而封出了所谓“造反”派以后，上头的“派”性中央即通过“造反”派，把一大堆完全是敌对性的口号，诸如“打倒”、“消灭”、“推翻”、“砸烂公检法”等等，直至枪支、弹药来对待他们。此外，“派”性中央还直接公开出面，把一块又一块的大石头，压在他们的头上。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尽管他们对受蒙蔽的人开枪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在敌对性的行动面前，采取对敌手段，予以还击，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些错误的罪责，应由“派”性中央直接承担。如果，片面地推在“保守”派的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保守”派是群众反对的，“造反”派是受群众欢迎的。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一直忙于搞封建主义的复辟政变，根本就无心过问国计民生、人民疾苦。这种情况，群众是不完全了解的。由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因而，错怪下面的所谓“保守”派，这是难以避免的。加上他们自己身上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旦恢复了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把

国计民生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逐步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相信他们是会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的。群众支持“造反”派，是要向他们要饭吃的。如果他们也跟“派”性中央一样，不过问国计民生，不关心人民疾苦，那末，群众也是会很快地就抛弃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科学地、有分析地而是片面地看待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犯特大的错误。

我们这样客观地、有分析地评价“保守”派，绝对不能成为“保守”派镇压或排挤“造反”派的理由，和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闹分裂、闹对立的理由，而“保守”派、“造反”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互相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地去揭发“派”性中央的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应该指出，“保守”派有的错误，是应该立即纠正的。比如，有的地方的“保守”派，竟杀人、放火、放毒，甚至颠倒是非，嫁罪于人等等，都有所出现。有的地方，则斗殴不同观点的干部，开除不同观点的职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这些错误做法，既帮助了“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又帮助了“派”性中央找到了压迫自己和支持“造反”派的理由，从而加深了分裂。因此，它是害人的，又是害己的。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郑重地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地彻底地改正过来。

〈四〉

其实，犯了错误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派群众，都犯了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的特

大错误。这就是，以一个能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利益的，复辟封建主义的龙袍加身的“派”性中央；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各级党委，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委员会”。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种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用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行使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赋予她的神圣职权。并全力以赴地保证其实现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伟大的党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会有七亿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远大的前途。

〈五〉

“派”性中央的哪些东西，必须立即展开大批判呢？

“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是一条张国焘式的分裂党、分裂人民的叛党的派别路线。这是“派”性中央，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原理而提出来的；是根据他们分裂八届中央，实行篡党、篡国、篡军，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条派别路线，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国的政治气氛。现在全国各地两派所执行的，都是这样一条派别路线。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如果，不彻底地批判这条派别路，就不可能彻底刷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保守”派身上的种种政治侮辱，及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受蒙蔽的“造反”派，提高觉悟，起义归队。总之，一句话，绝对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两派的争端问题。而军队战军队，干部战干部，群众战群众，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啊！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

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牲，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内战的根源。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以及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放松了“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的批判，而再争下去，再打下去，再战下去，那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完蛋了。而这，仅仅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者高兴。亲爱的同志们，清醒过来吧！

〈六〉

我们呼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在各军种、各兵种的班排里，开展对“派”性中央的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路线、理论和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最有效、最迅速、最彻底地肃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广大指战员的蒙蔽和思想毒害。切切实实地，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把保卫党中央的全部成员和全部国家领导人员顺利行使职权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个人，有任意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

如果，你们是封建王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绝对不能片面地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而应该以自己受蒙蔽、受欺骗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两派群众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引导他们立即参加对“派”性中央开展大批判的伟大斗争；参加保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伟大斗争。及时地把两派完全错误的斗争矛头，扭转到正确的方面来。

〈七〉

我们呼吁正在互相交火、互相争吵的两派同志，应该立即停止永远没有完结、没有前途、没有胜利希望的，自相残杀的战斗。立即主动地把自己的武器封存起来。（待到两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和大团结以后，再由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把两派武器收回国防仓库）。必须认识，坚决地批判从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坚决地保卫党的八届中央重新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才是两派的共同利益，才是七亿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因此，我们建议两派同志，立即把被自己“打倒”了的领导

同志,不问其观点和派别如何,一律送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去。因为,他们都是“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并支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个别确实有错误的,也应该由上一级党委的监察机关去处理,绝对不能由个人或派性组织去处理。此外,两派必须立即把被自己一方关入监狱的对方同志,无条件地释放出来;把被自己一方斗殴成伤的对方同志,加以切实的医治,迅速恢复其健康;把被自己一方赶走了的对方同志,一律欢迎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双方都要撤销对对方实行经济封锁的错误措施。以畅通城乡经济和物资交流。两派都要放弃自己的派别利益和派性立场,从完全错误的组织里面,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总之,双方都要主动采取一切正确的有效措施,来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保证两派在伟大的保党反“派”斗争中,重新团结起来。

必须认识,“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的两件宝贝。两派组织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完全错误的理论服务的。因此,两派组织都是分裂我党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极为有害的毒剂。在批判“派”性中央的错误的同时,放弃和取消这些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明白,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代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离开无产阶级的这一系列的阶级组织,去另起炉灶,成立别的组织,都被认为是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派别组织,必须开展批判。因此,我们呼吁两派同志同时放弃自己的派性组织,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我

们希望得到两派同志的热烈赞同。

〈八〉

我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事实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在下面，而恰恰正是存在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内部。这就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同挟持领袖，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派”性少数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同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斗争；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同无产阶级的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的斗争；是复辟封建主义同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当前我国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实质内容。但是，这场斗争，正确的东西被压制，而完全错误的东西，却又占了上峰。因而，也就形成了极为曲折，极为复杂的局面。

在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到底是应该支持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还是支持“派”性中央的错误少数？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谬论？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到底是应该支持“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还是支持封建主义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作出丝毫不苟的明确的答案，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遇到的空前

未有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希望一切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在保党反“派”的伟大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九〉

此外，我们必须再次提起同志们的注意。对一时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是我们的革命后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只能采取百般爱护的方针，热情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迅速地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而绝对不能对他们采取打击报复和镇压的错误措施。绝对不能采取“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错误手段对待他们。在分配工作、升学就业、征兵入队等等方面，应该一视同仁地，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

在全国完全实现了全面和平以后，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机，对牺牲在两派战争的战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两派群众和干部、青年学生，全面进行抚恤，安慰他们的家属，以便牢固地实现全国人民的真正大团结，更有效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团结起来吧！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斗争，是正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重新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通过